第五章 覺世、遊戲或其他：小說的時事與社會關注

許多新小說研究者指出了清末小說具有高度「新聞化」[1]的傾向，因此新小說中的時事與社會關注在前行研究裡討論甚豐[2]，最顯著且最具代表性的考察莫過於阿英的《晚清小說史》，該書討論晚清小說如何「反映」各重大事件，如：庚子事變、反華工禁約、工商業戰爭與反買辦階級、立憲運動、種族革命、婦女解放、反迷信運動、官僚生活暴露等等。這樣的研究路徑影響甚廣，到了二十世紀 50 至 70 年代大行其道[3]。然而，在這樣的關懷下，近代小說研究往往成爲一種文藝社會學式的考察，忽略了小說時事關注的其他可能。「時事」在小說中或爲前景，或爲背景，然而在《月月小說》「趣味、道德、啓蒙」的三大面向下，這些時事是否真的只限於批判現實，而無人性關注[4]？

爲解決此問題，本章先爬梳《月月小說》發行時間的背景資料；爾後由此時間背景去追索事件如何在小說中被再現、關注，挖掘文學世界如何與現象界互動；以及在一切求「新」的狀態下，將打造出何種新的國民性格。本章試圖由

---

[1] 除了小說新聞化外，新聞也有小說化的傾向，早期《申報》在報導「奇聞」時，時常運用小說筆法加以渲染，也頗注重情節佈局。參見陳伯海，袁進編：《上海近代文學史》，頁 228。另一方面，小說／新聞相互影響之現象與文學媒體的發展亦有高度關聯，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頁 66-97。諸位研究者亦不約而同地指出近代小說中有大篇幅的「政論」、「演說」，藉此傳遞作者自身的政治／社會觀察與改革意見，及其感時憂國的心情，夏志清著；丁福祥，潘銘燊譯：〈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頁 463-465；李歐梵：〈追求現代性（1895-1927）〉，《現代性的追求》，頁 233-241；陳伯海，袁進編：《上海近代文學史》，頁 301；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頁 93；袁進：〈政治的雙重作用〉，《近代文學的突圍》，頁 227-250；駱冬青：〈「小說爲國民之魂」：論晚清「小說學」的奠立與政治教化的關係〉，《明清小說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139-152；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264-272 等等。

[2] 參見阿英：《晚清小說史》，頁 44-147。

[3] 相關整理參見韓偉表：《中國近代小說研究史論》，頁 141-161。這些研究多爲文學社會學式的考察，自有其洞見與不見，然而對當代近代新小說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影響，如崔桓曾指出晚清小說的意識特質中有一重要特質爲「現實批判意識」，對政治、社會、道德理念皆有所批判。參見崔桓：《晚清小說之特質研究》，頁 267-304。賴芳伶則透過近代小說的此種社會屬性特點，分析當時的新思潮／舊觀念；官場／民間；以及小說對於社會事件的容納，藉以考察作家如何回應時代。參見賴芳伶：《清末小說與政治社會變遷（1985-1911）》（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另外亦有諸散見論文討論了單一社會事件、政治運動在小說中的反映狀況，不勝枚舉，閱者可分別觀之。這些研究皆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本文企圖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以挖掘、探究這些社會／政治事件，以及各種思潮在小說中作爲前景或背景的作用。

[4] 《上海近代文學史》中以爲此時期的小說對人心世界失落。參見陳伯海，袁進編：《上海近代文學史》，頁 227-228；袁進亦以爲「譴責小說作家」努力採用一個儘可能多地包容奇聞的小說結構，已不如《儒林外史》一類的諷刺小說洞悉人性靈魂。參見袁進：〈作品與時代〉，《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頁 307。

細讀時事、社會材料與小說，找尋出在《月月小說》主軸下，這些政治社會議題是覺世、遊戲，又或有其他可能。希望能在「文學社會學」式的考察外，更進一步以文本世界爲中心。

第一節《月月小說》發行時間的文化背景

一、新小說的特色

阿英以爲晚清小說的特徵，即在於反映社會：

> 第一，充分反映了當時政治社會情況，廣泛的從各方面刻劃出社會每一個角度。第二，當時的作家，意識的以小說作為武器，不斷對政府和一切社會惡現象抨擊。[5]

魯迅在講述清末譴責小說時，也指出此一面向：

> 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6]

由此可知，近代小說與政治、社會之間的脈動緊緊相依，梁啓超在鼓吹小說界革命時，亦努力關聯「小說」和「群治」兩者之間的關係。當時小說界又對此也有頗多贊同聲音：

> 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7]

> 婦女一變，而全國皆變矣。雖然，欲求婦女之改革，則不得不輸其武俠之

[5] 阿英：《晚清小說史》，頁 4。
[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 205。
[7] 脫广：〈小說叢話〉，《新小說》第 7 號（1903 年），頁 168。

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識。此二者皆小說操其能事，而以戲曲歌本為之後殿，庶幾其普及乎？[8]

小說者，覺世之文，寧繁無簡；又小說有熏、浸、刺、提四訣。作者本此意以述之，期乎不背其說。合全書觀之，當亦可以支配人道，使閱者豁目爽心。[9]

小說者，「今社會」之見本也，無論何種小說，其思想總不能出當時社會之範圍，此殆如形之於模，影之於物矣。[10]

鄙人近欲調查近三年來遺聞軼事，為《碧血幕》之材料，海內外同志，如能貺我異聞者，當以該書單行本及鄙人撰譯各種小說相贈，開列條件如下：一關於政治外交者，一關於商學實業界者，一關於各種黨派者，一關於優伶妓女者，一關於偵探家及劇盜巨奸者，其他凡近來有名人物之歷史及各地風俗等等，鉅細無遺，精粗並蓄，倘蒙賜書，請寄上海棋盤街小說林轉交可也。[11]

從諸引文看來，當時的小說家／評論家們對於「新小說」的看法的確是抱持著「反映社會」的觀點，甚至創作時亦講求考據。總而言之，在新小說的創作者／理論者的觀念中，小說的邊界就是現實社會。

這樣的文學觀念與創作態度亦呈現在《月月小說》的第一任主筆吳趼人身上：

我在月月小說社，認識了吳沃堯，他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我曾請教過他。（他給我看一本簿子，其中貼滿了報紙上所載的新聞故事，也有筆錄朋友所說的，他說這都是材料，把它貫串起來就成了。）[12]

近代小說家開始向社會取材，著眼於社會的紀錄以及對於「在場」（present）的強調，「目睹」、「現形」等等具有「進行式」意味的舉動，皆與「新小說」生發的原因有關。

---

[8] 臥虎浪士：〈《女媧石》序〉（1904 年），《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冊，頁 147。
[9] 二我：〈《黃繡球》第一回評語〉，《新小說》第 15 號（1905 年），頁 107。
[10] 曼殊：〈小說叢話〉，《新小說》第 15 號（1905 年），頁 165。
[11] 包天笑：〈天笑啓事〉，《小說林》第 7 號（1907 年）。
[12]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 427。

二、時事與文類的互動關係

不過，對《月月小說》的主筆來說，時事的「材料性質」可能遠大於小說的紀實傾向：

> 轟、轟、轟，萍鄉亂，醴陵亂，考諸輿論曰：「此饑民。」「此無告窮民。」聞諸官府曰：「此亂民。」「此革命黨。」又聞諸主持清議者曰：「此官逼民變。」此三說者，各持一義，我不能辨其誰是誰非，況且我近來抱了一個厭世主義，也不能暇其誰是誰非。只因這一番亂事在這亂地之內，逼出一個頑錮守舊的寒酸秀才來，鬧出了多少笑話，足以供我作小說的材料，並且這些材料又足以助起我的厭世主義。所以我樂得記他出來。[13]

「萍鄉亂，醴陵亂」指的是 1906 年在萍劉醴地區發生的事件[14]，吳趼人這段話拉出了對此事三種不同場域的論述：輿論、官府、清議，但就「小說家」來說，這三種立場都沒有對話的空間，「小說家」看這場事件的意義在於「足以供我作小說的材料」，並且是「笑話」，可見其對於這起「時事」的觀點是透過「小說創作」來思維。

另一方面，作爲「人」，對於時事的觀測自有其「指向性」，抱持著「厭世主義」所以不願涉入任何一個場域所企圖建構的論述中，其所關心的，是這起事件能幫助自己的「厭世」，因此才「樂」得寫出。我們可以發現小說家／人對於時事的關注態度所採取的是不同於政治場域內的力量牽扯，此中的「小說與群治」關係已經和梁啓超所倡議的關係有所不同，對於材料的「情緒反應」也有著多種層次的辯證關係。另一方面，不同的小說家在《月月小說》內也產生不同意見下的張力，在第三章中，已討論過了《月月小說》中的小說入話有「我」（作者）的成分，他們議論時局，以此明志，企圖覺世的想法在在彰顯於入話中，這和吳趼人的態度有所參差。

同樣的事件，在專門品評時事、社會風氣的「譏彈」欄中，則有完全不同的

---

[13] 吳趼人：〈上海遊驂錄・第一回 恣毒燄官兵誣革命 孝忠忱老僕勸逃生〉，頁 53。
[14] 詳細討論參見苑書義等著：《中國近代史新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278-280。

思考角度。在〈哀哀中國無告之民〉中，論者新广將萍劉醴地區事件與江淮徐海事件並舉，前者被官兵剿盡，後者卻被解救：

> 嗚呼，江淮徐海之民，固皆中國之民也；醴陵萍鄉之民，甯非中國之民歟？既同為中國之民，何相待之異判若天淵哉……夫人情大抵皆好生而惡死，萍醴之民甯獨不然……吾聞之當其始也，繁捐重稅以苦之繼來；米珠薪桂以困之終也，匿荒不報，諱災以逼之，及其亂也，乃為奇貨以居之。[15]

作爲評論性文字，時事成爲被討論的對象本身，而非小說創作中的「材料」，論者溯清「亂」之始、終，並且援引朝廷文書內「我軍兩百人應敵，尚幸得手」[16]文字，說明朝廷將人民視爲敵人，全力剿殺，實非文明之舉：

> 近世紀以來，各國文明日進，彼此皆以同種相殘為戒，即在異種異國之人，亦保守和平，不肯輕易開戰，及至萬不得已，而以干戈從事，亦許釋械投降，從不坑陷全軍。且款待俘虜之法，亦至精至備……今吾醴陵萍鄉之民，其為俄德英日之人歟？猶是中國之人也，何其對待之手段較之異國仇敵尤為苛刻也？[17]

評論者從民族、文明等新術語／思維來評價萍劉醴之「亂」，並以國際戰爭爲參照系，指出同種相殘的不文明，以及「中國公道」的滅絕。十九世紀以來，康梁強調「保國」、「保種」、「保教」，加上當時民族主義盛行，「中國」已優先於「大清」，「炎黃子孫」一詞讓中國人有了共同的祖先[18]，國族記憶也因此被發明（invention）。此文名爲〈哀哀中國無告之民〉，一開始已將視線定於中國人民身上，因此不同意朝廷的作法，從民族、血緣的角度思考，一方面可見新知識的滲入，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見同樣的事件在小說、評論兩種不同文類的不同處理方式。

---

[15] 新广：〈哀哀中國無告之民〉，《月月小說》第 5 號，頁 247-248。
[16] 同上註，頁 249。
[17] 同上註，頁 250。
[18]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皇帝神話與晚清國族的建構〉，輯入盧建榮主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284。

三、《月月小說》發行時間的時空狀態

（一）中國發展路線：立憲／革命之爭

《月月小說》發刊期間爲 1906 年至 1908 年，在《月月小說》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月月小說出版祝詞〉中即點明了當時的時空氛圍：

> 方今立憲之詔下矣，然而立憲根植於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達之士夫，而在多數在下之國民。苟不具其資格，憲政何由立，自治何由成？支那四千年專制之毒中於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謂民權焉、自由焉、憲法焉、選舉焉。至於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數之國民則仍瞢瞢焉，而未有知也……西人皆視小說於心理上有莫大之勢，則此本之出，或亦開通智識之一助，而進國民於立憲資格乎。以是祝之。[19]

在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略爲窺見當時的社會狀態：政治上朝廷下詔「準備立憲」，然而社會上卻分爲兩種類型的人，明達之士夫／多數之國民，前者「稍知」，後者「瞢瞢」，顯然都仍對新學（尤其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政）有著不同程度的陌生。而《月月小說》的目標就是要幫助國民具備立憲的資格，打造立憲國民的體質；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看到當時新學在中國的傳播狀況，單爲一篇賀詞，就可見「專制」、「民權」、「自由」、「憲法」、「選舉」、「國民」、「心理」等等詞彙，而在這些詞彙背後的意義也一併被傳播、詮釋，可見當時的知識結構、框架已有劇烈的轉變。

晚清社會與政治乃是一連串彼此相互關涉的反應，1901 年清廷頒布新政，這是朝廷開始清楚意識到自身必須改變的重大措施，清廷推行新政主要針對三方面：軍事、教育、行政制度。軍事方面主要是編練新軍，並於 1901 年下諭停止武科科舉考試，建武備學堂，編練常備軍。新軍之營制、服裝、器械皆效法西方，並灌輸效忠大清之教育；教育方面重大措施爲廢除科舉與創辦學堂，只要是學堂畢業生考試後可得功名，出國留學返國後也可得科名。1906 年，學部頒布教育宗旨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並將經學設定爲各大小學堂之必修

[19] 延陵公子：〈月月小說出版祝詞〉，頁 1-2。

科目[20]。由此觀之，在新式教育師資仍然青黃不接的狀況下，學堂仍多舊制課程與思想[21]；行政制度主要是集中在改革官制、整頓吏治。1901 年撤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設外務部。另一方面，清政府亦下令「停捐納、裁陋規、定公費」等政策，企圖藉此整頓吏治，革新政務人事，避免捐輸而造成不適任的人員[22]；並且禁止官吏對下屬收取規禮[23]。

雖然政府認爲新政將有利於去除國家積弊，但在《月月小說》的許多小說中，可以發現其批判了許多留學生、官員，描寫其貪戀功名的樣態，或是塑造了許多乘新政改革、新風潮之先，而企圖從中獲利的人物。在符合西方現代意義下的政策頒布後，「國民性」卻沒有跟上腳步，反而是產生更多的問題。小說家體認的現實世界與執政者不同，他們考量更多的人性問題，或者說是生活在這樣時空氛圍下「人的處境」，因此小說世界才有這些形形色色的「負面」人物，但也唯有透過這些負面角色，人們才得以反思現實世界的自我生存狀態。

而在國家路線發展上，由於日俄戰爭（1903-1905 年）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被解讀爲立憲政體的勝利，1905 年清政府下諭派遣五大臣出洋至日、英、美、德、法考察其政府體制，並評估中國是否適合採行憲政體制。1906 年五臣返國，建議採取憲政體制，同年九月，下諭「憲政準備工作」[24]。

然而早在清廷準備立憲前，國內對於立憲／革命早有路線之爭，事實上這樣的差距在戊戌變法（1898 年）前已有蘊釀，前者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主；後者則以孫中山爲主，兩派在戊戌變法前本是和平地處於「救國」的旗幟下[25]，然在戊戌變法後，其間主張卻日益分明[26]，經歷了八國聯軍、庚子拳亂（1900 年），梁啓超自美返中後（1903 年）開始斷然地與革命派分庭抗禮，以爲國民素質尚

[20]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第五冊，頁 5493-5494。
[21] 參見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七章 1901-1911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440-441。
[22] 同上註，頁 451。
[23] 當時官吏「到任有費，節壽有費，查災查保甲有費，甚至車馬薪水莫不有費。」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頁 4928。
[24] 清廷首先採取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原則，並進一步採取諸多改革措施。參見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七章 1901-1911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頁 453。
[25] 參見苑書義等著：《中國近代史新編》下冊，頁 129；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頁 540-545。
[26] 然兩派之間仍有往來，參見上註，頁 130。

未到達可革命的狀態，勿「徒羨民權」[27]。然不論立憲或是革命派，兩者皆各自握有媒體資源以推行主張[28]，可見當時報刊與政治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立憲／革命兩種選擇的在知識界的熱絡與發酵，近因可歸於清廷新政的實施，尤其是教育改革、科舉廢止，使得近代知識分子形成，其生活型態與知識狀態開始逐漸揮別過去的科舉導向；遠因則可推至戊戌變法，楊念群以爲，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的差異，正在於後者仍採取傳統的血緣與倫理來強化軍事，但前者卻以「合群」爲方向，「淡化了與地方鄉土血緣的聯繫，構成了流動性很大的知識階層」[29]，其更進一步指出：

> 維新運動表面失敗終於離析出了中國近代變革的雙重取向：一種取向是通過變革「王權」的核心組織，使中國社會中本來就蘊涵著的「理性因素」更具現代化之特性；另一種取向是變革地方性政權及其思想價值系統。[30]

據其論，革命路線屬於前者，立憲路線屬於後者，兩者皆由維新運動產生。這也說明了此路線之爭乃基於知識份子對於社會、政治的關注，並且皆受到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刺激[31]，而同時在近代政治圈中進行角力。

---

[27] 梁啓超：〈敬告我國民〉，《飲冰室全集》第 5 冊（台北：文光出版社，1959），頁 23。

[28] 立憲派握有《清議報》（1898 年）、《新民叢報》（1902 年）、《外交報》（1902 年）、《東方雜誌》（1904 年）、《揚子江》（1904 年）。關於立憲派的詳細媒體資源，可參考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台北：漢京文化，2004），頁 732-734；革命派握有《中國日報》（1900 年）、《國民報》（1901 年）、《嶺東日報》（1902 年）、《亞洲日報》（1902 年）與《覺民》（1903 年）、《中國白話報》（1903 年）。關於革命派的詳細媒體資源，可參考胡香生：〈報人、報業與辛亥革命〉，《湖北文史資料》1996 年第 1 期，頁 109-126。

[29] 楊念群：〈士大夫的流產變革〉，輯入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 1800-1949》（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6）第一卷，頁 132。

[30] 同上註，頁 134。

[31] 例如革命派受到美國《獨立宣言》的啓迪，參見潘光哲：〈美國《獨立宣言》在晚清中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7 期（2007 年 9 月），頁 1-55。潘氏由《獨立宣言》背後的諸多西方現代政治思維，如「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等觀念，皆是《獨立宣言》翻譯後在近代中國所奠基的「知識倉庫」，而進一步被孫中山爲代表的革命派所汲取、轉化、運用。此外亦可參酌俞旦初：〈美國獨立史在近代中國的介紹和影響〉，輯入氏著：《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北京：社會科學院，1996），頁 202-241；而立憲派亦有「三權分立」、「天賦人權」、「代議政府」等觀念，乃至於到 1907 年有人主張「國民立憲」。參見徐小明：〈晚清君主立憲思想的歷史考察〉，《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5 期（2008 年 9 月），頁 112-118。還有日本政治思想如何影響中國，可參考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爲例〉，《二十一世紀》第 45 期（1998 年 2 月），頁 47-54。有關「知識倉庫」的論點，參見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第 16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頁 137-170。

立憲派和革命派雙方在 1905 年至 1907 年也透過報章雜誌不斷進行論戰，其論戰內容討論範圍甚廣，涉及了「保清」、「革命」、「民權」等等。[32]因此，當清廷下諭「預備立憲」之際，立憲派與革命派的活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立憲一派全力支持朝廷此舉，且認爲五大臣出國考察一事頗善，各地立憲派也在此時成立了各種組織以推動立憲[33]。但是清廷卻在 1908 年查禁新聞社，下令逮捕康、梁黨羽，然而此舉卻無法停止中國各地立憲派的願望，他們仍不斷地在中國各個地區發起請願活動。是之，1908 年 9 月，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34]，宣佈以預備立憲需以九年爲期。

同時間，革命派也在各地起義[35]。革命派這些起義其實與立憲派、清廷舉措都彼此牽扯、影響。據李秀領之考察，1907 年清廷有企圖暫緩立憲之舉，然革命派的起義活動卻使得他們不得不繼續推動立憲[36]。由此可知，立憲／革命的路線之爭，在《月月小說》發行時期乃爲一重要的政治風潮，席捲中國，立憲／革命，乃至於朝廷的措施也都紛紛成爲小說創作的材料。

在《月月小說》第八號（1907 年）的「譏彈」欄中，即針對「革命說與立憲說之評論」刊登了三篇文章：〈革命派之遠因近因〉、〈立憲說與革命說之大激戰〉與〈革命有罪立憲亦有罪乎〉。第一篇文章對革命說進行溯源，第二篇文章則爬梳當時兩種路線在報刊上的爭辯，最後一篇文章則是對此兩種路線的評價：

> 夫妄談革命者誠罪不容誅矣，然則主張立憲而反對革命者亦仍負罪而未釋，此則吾大惑不解，而天下人所為之竊笑者也。[37]

---

[32] 參見苑書義等著：《中國近代史新編》下冊，頁 240-257；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頁 570-573。

[33] 1906 年 12 月，「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此爲國內首個立憲團體；1907 年康有爲將保皇會改爲「帝國憲政會」，梁啓超在東京成立「新聞社」。參見李秀領：〈「新政」的替代物——革命〉，輯入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 1800-1949》第一卷，頁 218。

[34] 相關內容，參見上註，頁 220；苑書義等著：《中國近代史新編》下冊，頁 273。

[35] 1907 年有廣東黃崗起義；同年 9 月亦有廣東防城起義；1908 年則有一有計畫之河口起義。雖然幾次起義都宣告失敗，然而仍不斷有新團體組成，例如 1907 年秋瑾主持大供師範學堂校務，組織「光復軍」，並參與徐錫麟之皖浙起義。同上註，頁 282。

[36] 李秀領：〈「新政」的替代物——革命〉，輯入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 1800-1949》第一卷，頁 220。

[37] 新：〈革命有罪立憲亦有罪乎〉，《月月小說》第 8 號，頁 219。

評論者對立憲的擁護不言可喻，而他對革命的態度是：

> 革命之說，今於中國亦推行漸廣，幾於賤至俳優走卒，皆能道之。甚者，內地土匪亦以此二字揭赭矣。若此者，殆亦吾國文明進化之一徵也歟。[38]

透過這種諷刺的語言，說明革命路線只是證明中國的「文明進化」，對於國家發展並無實質幫助。在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月月小說》的立場。但是在小說創作中，卻又似乎對立憲仍有所保留，且反覆思考立憲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而小說與評論對於「立憲」一事所呈顯出的態度之所以有所參差，乃肇因於評論文章聚焦於「立憲」本身；小說則是將立憲放置於「人」的生活當中，著眼的角度不一致，態度自然有所不同。

（二）文化、風俗的轉變

1. 百科全書式知識框架：對新學的接受

熊月之指出 1900 至 1911 年的西學傳播特色有五[39]，當時因有翻譯與新式教育編輯教科書的宣揚，以及戊戌時的西學基礎，新學[40]於是大量湧現。自從嚴復翻譯《天演論》後社會上普遍瀰漫著「天演進化」的觀念[41]。「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思維模式廣爲流傳，許多知識份子以此向度，企圖改革中國，胡適曾言：

> 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42]

---

[38] 新：〈革命有罪立憲亦有罪乎〉，頁 218。

[39] 分別是從日本轉口輸入；傳入數量空前；社會科學比重加大；藉由新式學堂的教科書編寫、傳播，此時西學影響層面甚爲廣泛；中國第一代獨立翻譯人才的出現。參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緒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 13-14。

[40] 關於「西學」與「新學」兩詞之間的辨別與其涵義，前行研究者多有關注。王爾敏以爲 1984 年新學大盛。參見氏著：〈十九世紀中國士太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 23；羅志田則以爲「新學」一詞較具普世性。參見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44。而劉紹玲總述前端，將「新學」一詞置放在「現代性」的線性時間思維下思考，以爲此詞之提出，展現了近代中國從空間到時間的新型態感知狀況。參見氏著：《尋找晚清「新」話語》，頁 35-39。

[41] 同上註，頁 400；羅福惠：《長江流域的近代社會思潮》（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25。

[42] 胡適：〈在上海〉，《四十自述》（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頁 54。

《天演論》在 1900 至 1911 年共出版了 30 幾個版本[43]，其觀念的流傳與接受程度不言可喻，不論立憲或是革命，都接受了進化論的觀點，並且加以宣傳、轉化，進一步爲自己的主張背書。[44]

除進化論的觀念外，自然科學（格致）的觀念也被廣爲宣揚提倡[45]。從當時的翻譯著作來觀察，可發現在哲學、倫理學、歷史學、社會學、地理學皆有所傳播，但仍以政學、自然科學爲最多[46]。除了翻譯書籍外，教科書的內容也包羅萬象。爲因應新式教育，各類型的課程皆有相對應的教材，其中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影響層面最廣，內容涉及了物理學、化學、地文學、地質學、礦物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外國語學、理財學、師範等等內容。當時教科書的圖書樣式、學科分類、專有名詞、單元設計多仿效日本教科書，足可見當時「西學從東方湧來」之景。[47]

由此觀之，當時社會對於西方的各種知識皆有多元的吸收與流入，崇真的科學精神、自由平等的政治法度、男女平權，反對纏足的女學，種種新學都對當時社會造成莫大的影響與改變。熊月之進一步指出此階段的特徵：

> 令人眼花撩亂的新學科，目不暇給的新名詞，令學術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今人習用的許多名詞、術語，諸如社會、政黨、政府、民族、階級、主義、思想、觀念、真理、知識、唯物、唯心、主體、客體、主觀、客觀、具體、

---

[43] 羅福惠：《長江流域的近代社會思潮》，頁 126。

[44] 例如梁啓超曾多次撰寫文章，系統地介紹達爾文、斯賓賽、赫胥黎的學說，並以社會達爾文主義說明「立憲」乃當今世界之「新陳代謝」之公理；革命派則以爲當前是個「競爭」的時代，列強勢力不斷膨脹，國家、人民必須自立，否則即被淘汰，並認爲革命是進化之一端。同上註，頁 127-131。前輩學者對進化論在中國興起、引介、流行有諸多討論，其中陳衛平從甲午前的「中體西用」、「道器二元」論述至康有爲倡導進化論、嚴復完整地賦予進化論世界觀，詳細地譯介了達爾文進化論思想，並予以評述。陳氏由「內在邏輯」論述了進化論流行、普及的可能。參見陳衛平：〈中國近代進化論思潮形成的內在邏輯〉，《文史哲》1996 年第 3 期，頁 25-29。王中江則由進化論的譯介切入考察中日知識交流狀態，當中仔細爬梳了諸多名詞的翻譯定稿：evolution、struggle、selection、natural selection、artifical selection 等等。透過中國知識圈如何選擇／接受嚴復或日本翻譯之詞彙，以論述日本在西方—中國知識流通的中介位置。參見王中江：〈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與日本的中介作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1995 年第 3 期，頁 88-93。

[45] 世紀初，有許多科學相關知識的團體成立，如亞泉學館（1900 年）、普通學書室（1901 年）等等，亦有諸多科學雜誌，如《亞泉雜誌》（1900 年）、《中外算學報》（1902 年）、《科學世界》（1903 年）、《中國醫學報》（1910 年）等等。羅福惠：《長江流域的近代社會思潮》，頁 150。

[46] 詳細討論參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 657-661。

[47] 同上註，頁 667-668。

> 抽象等，都是那時確立的。[48]

而在《月月小說》中也多有所呈現，除了直接以新學入小說外，也有對於這種種現象的觀感，甚至是對於教育體制、改革問題的回應。從當時報刊上所登載的書店廣告，便可見知識框架的巨變，《小說林》第四期有宏文館新出的《博物大辭典》廣告：

> 本書編纂之趣旨因國民於博物學最少經驗及研究，以致實業不興理學滋昧。本社延聘通士搜輯群書，舉凡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生理學，所用之名詞、學語一一加以注釋。而於植物、動物之分科生態；及礦物之成分應用；與生理之組織攝養，尤加一層注意。[49]

從「博物」一詞觀念的轉變，即可見近代認識論的轉向：由古典的「博物治聞」，即學問廣博、見多識廣[50]，轉化而爲具備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生理學等現代學科意義下的知識體系。而從這則廣告看來，「博物學」的概念除了涵攝了各種科學的種類外，在各類知識下強調「分析」性：分科、成分、組織等等。博物學由各種知識構成，而各種知識又可再析出各種更細微的關注點。

晚清受到新學輸入的影響，各種啓蒙新知都處在萌發與被介紹的階段，因此可見許多類型的知識入門書籍，亦有統攝各類知識的「百科」「全書」[51]，除此之外亦有諸多「類編」[52]，這些都反映出了當時對於各種場域之事，往往採取「整體」由「部分」組成的思維方式，不但關注整體，亦關心部份。在《月月小說》中，除了小說內化用許多新知外，單一政治事件的發生，小說家也從諸多面向思考這件事，將之放在各種不同的空間、人際關係去試探、對話。

---

[48]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緒論》，頁 14。
[49] 《小說林》第四期（1907 年），頁 20。
[50] 于翠玲：〈從「博物」觀念到「博物」學科〉，《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3 期，頁 107。
[51] 百科全書的意義有二：對大量分類知識所做的系統陳述；一系列篇幅相對短小的單冊書，分別綜述某一特定主題，其往往宣稱意圖涵蓋所有知識領域。參見德・瓦格納（Wagner Rudolf G.）：〈晚清新政與西學百科全書〉，輯入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34。
[52] 同上註，頁 44。

2. 魂與肉：社會生活與風俗的革新

民族主義與國民意識的興起，讓社會普遍的風俗與生活習慣也起了變化。當時知識分子不論立憲、革命派皆倡議「國魂」，梁啓超在 1899 年發表〈中國魂安在乎〉一文中即表明：

> 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欲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為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為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53]

革命派在 1903 年亦有類似文章，針對「國魂」提出想法，其主要在說明中國人之諸多陋習，爲「奴隸魂」、「僕妾魂」、「囚虜魂」、「倡優魂」[54]，感嘆中國魂之敗壞至此。

梁啓超、嚴復等人認爲打造國魂必須廣開民智，到 20 世紀初，知識份子對國魂的想法則轉爲一種現代「國民」的意識，要破除中國人的「奴隸性」[55]，因而有一連串相關的風俗、生活習慣改革：

> ……除了經常發生的，有時還是規模巨大的排外示威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模的運動。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烟、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畫，到組織學聯、勞工聯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56]

「魂」是精神層次的關注，然要改善將抽象的魂，則必須從實際的肉體生活著手。在當時有許多對傳統風俗、生活習慣的改革運動，例如女性教育即爲一重思潮，人們開始思考過去對於女性的忽視與壓抑，並期待開啓「女智」，追求「自由結婚」，在女性意識的推動上，秋瑾與何震爲重要人物，她們雖採取不同的觀點，

---

[53] 梁啓超：〈中國魂安在乎〉，輯入梁啓超：《飲冰室全集》第 42 冊，頁 40-41。
[54] 壯游：〈國民新靈魂〉，羅家倫主編：《江蘇》（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1968）第 5 期（1903 年）。
[55] 佚名：〈箴奴隸〉，羅家倫主編：《國民日報彙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1983）第 1 集（1903 年），頁 0016-0036。
[56]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頁 573。

但卻同樣爲女性發聲，追求女子權利[57]。

在女性改革最具指標性的應爲「禁纏足」之舉，女子纏足一事始自五代，至清朝仍風行不墜，「小腳」成爲女性身體重要的審美指標，女性也因此「深入簡出」。在世紀初以前，就已陸續有反對纏足的聲浪[58]，至清廷頒佈新政，准許「滿漢通婚」的諭令中，明確表明纏足「有傷造物之和」，希望能加以勸導「以期漸除積習」[59]。此詔一出，各地地方官員紛紛響應宣導放足、禁纏足，並將解除纏足一事與當時「強種強國」的概念聯繫，強調纏足對女性身體健康、生活的傷害與不便。同時也與當時的主流新思潮，諸如「男女並重」、「女子教育」、「種族盛衰」等等合流[60]；另一方面，報刊輿論也多倡導禁纏足，加以女性學堂的誕生，其多要求入學學生不能纏足，逐漸地，世紀初的女性開始以天足、受教育爲文明、時尚的指標，一般人對纏足的贊成與否，也成了「文明、進化」與否的表徵[61]。

相對於女性的放足，男性的「剪辮易服」也爲異曲同工之舉。戊戌時，康有爲曾上書主張「斷髮剪辮」[62]，但被清廷所拒。但在 1903 年開始，開啓了剪辮風潮，報刊開始出現抨擊留辮之舉乃效忠滿清、國力衰頹的象徵。海外留學生亦率先剪辮，企圖接此剪除自己乃衰敗「支那」人的身分[63]。留學生頂著短髮回國後，進入了國家體系、新式學堂工作，他們改穿西服，此種外在形象遂成當時時髦裝束，而「剪辮」也成了文明、進步、追新的象徵[64]。

小說家經常對小說人物進行外在穿著的描摩，這是因爲當時社會很容易「以貌取人」，透過對身體的管理方式，便可輕易地辨認出此人屬於何種群類：

---

[57] 詳見羅福惠：《長江流域的近代社會思潮》，頁 196-198。
[58] 鄭觀應有〈論纏足〉一文，文中直指纏足對女性的戕害；1877 年，外國傳教士在廈門組織「戒纏足會」；維新運動時期，各地亦有戒纏足會，後梁啓超、譚嗣同在上海成立戒纏足會總會，並於報刊上發表文章、上書光緒皇帝。參見李長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頁 363-369。
[59] 朱壽鵬編：《華東續錄・光緒朝》（合肥：黃山書社，2008）卷 171，頁 7。
[60] 詳細討論參見李長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頁 370-371。
[61] 同上註，頁 378-383。
[62] 康有爲：〈請斷髮易服改元折〉，輯入康有爲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爲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四冊，頁 432-434。
[63]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頁 412。
[64] 李長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頁 341-342。

> 那人道：「完民，我覺得改裝這件事體可以不必，有許多沒有出過洋的人，尚且改做西裝，何況你留學多年的人……並不是說笑話，你沒有曉得，西裝要算留學生的個招牌，不知要討多少巧，不說是內地，就是上海連坐東洋車都拉得快些。」[65]

本來是作爲身分表徵的身體管理，到後來卻容易變成取巧者投機之處，小說家著眼於此，藉由外表而寫心靈。

在「強國保種」的口號下，禁煙也成了重大策略。鴉片戰爭的戰敗，使得鴉片在中國廣爲流傳，甚至已由純消費，轉變而爲「生產、販售、吸食」一體的國家。[66]19 世紀末，煙館林立，土煙價格低、購買方便，吸食鴉片者日益趨多，同時間，鄭觀應、薛福成、郭嵩燾、左宗棠、曾國筌等人皆曾主張禁煙[67]，然而直至 1906 年，朝廷才下令禁煙，並以爲「吸食之人，廢時失業，病身敗家」，要全國「禁種罌粟」[68]。1906 年頒布「禁煙十條章程」，設立禁煙總局。雖然清廷有意以此強身強國，但民間社會卻積習難改，無法收預期之效。

打造國魂的相關舉措多成爲《月月小說》中小說的背景／前景，在小說中對國民性提出觀察與改造理想的目標，對女性的關注、留學生的樣態、吸食鴉片的病態，乃至於對奴性的批判、針砭，都成了《月月小說》作品的題材。

第二節 小說中的時事背景分析——以下詔立憲事件為核心

前述《月月小說》發行期最重大之事件即爲「下詔立憲」一事，而《月月小說》中也有諸篇小說以此爲背景：吳趼人的〈慶祝立憲〉、〈預備立憲〉、〈立憲萬歲〉、〈光緒萬年〉、〈大改革〉（又名〈立憲鏡〉）、〈黑籍冤魂〉，以及春颿的「立憲小說」〈未來世界〉。

---

[65] 雁叟：〈學界鏡 第一回・喜學成電催歸祖國 問目的語出動賓筵〉，《月月小說》第 21 號，頁 22。
[66] 胡金野：《中國禁煙禁毒史綱》（台北：宋氏照遠出版社，2006），頁 78。
[67] 同上註，頁 91-99。
[68] 朱壽鵬編：《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頁 5570。

在下詔立憲的時空氛圍中，賭煙嫖的戒除、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等相關議題亦隨之而起。本節以下詔立憲一事爲主軸，進而選擇相關小說，考察政治事件如何在小說被重寫。

一、對於立憲和預備立憲的討論

（一）台上／台下的錯位對話

〈慶祝立憲〉中，首先針對朝廷下詔「預備立憲」一事進行評論，「莽夫」對眾人「慶祝立憲」一事深感不滿，以爲現在只是「預備立憲」，應是「慶祝預備立憲」才對：

> 「立憲，立憲，做夢，做夢！慶祝立憲，慶祝立憲，這是在那裡發大熱病，說夢話！咳！諸公沒睡醒，有那醒的在旁邊醒者，笑痛了肚子呢！咳！羞不羞啊，羞不羞？」[69]

莽夫進一步由此延伸出對「預備立憲」的想法：

> 我告訴諸公，今兒是宣佈預備立憲，不是宣布立憲；是叫你們往立憲那邊望望，叫你們望得見了，那就有點影兒了。並不是說你們已經望見了，叫你們往那邊跑啊！[70]

一在強調現階段是「預備立憲」，和「立憲」之間的距離與差異，表面上展現朝廷對憲政體制的態度，然而實際亦蘊含了人民「資格」是否能夠立憲的問題：

> 就是預備立憲，也不容易。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是怎樣辦法呢？拿咱們中國四萬萬人，一個個的都開了膛，破了肚，拿他這肚腸子，都送到太平洋去，洗刷一個乾淨，把他那自私自利、因循觀望的惡習都洗掉了……自私自利、因循觀望的惡習都沒了，那就可以預備立憲了嗎？早得很啊，還早得很！你擱得住那一般混帳官兒的壓制嗎？[71]

---

[69] 跰：〈慶祝立憲〉，《月月小說》第 1 號，頁 239。
[70] 同上註，頁 241。
[71] 同上註，頁 241-242。

將中國人四萬萬人與官員一併舉出，在在彰顯了人民距離「立憲」，甚至是「預備立憲」的資格仍非常遙遠，對於憲政體制非常陌生，甚至連「立憲」和「預備立憲」當中的差異都不明白。

莽夫在台上高聲呼籲，強調在三，這種「演說」場合在近代小說中經常被書寫，陳平原針對這種議論化的書寫模式提出看法：

> 這些議論不只新穎，而且不是由說書人而是由小說人物講述（或演說或答問），不少甚至是作家創作構思的中心。[72]

從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之後，新小說（政治小說尤甚）中時常出現長篇的演說場景[73]，這是其用來「覺世」與啓迪民智的技巧[74]。不過在〈慶祝立憲〉中，書寫莽夫的演說內容顯然別有深意，小說的開頭是兩位路人甲、乙走進會場，此後當莽夫在台上滔滔不絕時，甲、乙兩人立即在台下做出回應，形成一有趣的「對話」結構：

> 莽夫說至此處，略一閉目，忽又張目大言曰：「……我說要是一定想著預備立憲，就要把那混帳官兒開了膛，破了肚，拿他們的肚腸都送去太平洋去洗刷乾淨，把他那侵人自由的惡習都洗掉了，那麼，我就恭頌大清君主立憲國萬歲！皇太后、皇上萬歲！立憲萬歲！」（鞠躬退）
> 甲勃然顧乙曰：「頌朝廷指頌萬世無疆，無頌萬歲之理，已經失體。頌皇太后、皇上可也，至於立憲，是何物事，乃舉與兩宮並稱，嵩呼萬歲？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此真大逆不道者哉！吾不欲觀之矣！」牽乙裾，悻悻徑行。[75]

在莽夫／甲、台上／台下的語流交匯下，小說以甲對於立憲不可「萬歲」的堅持下作結，突顯出了中國人民仍不具立憲資格的事實，這是對現實的針砭。然而另

---

[72]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120。
[73] 關於新小說對「演說」的運用與態度，可參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 年第 3 期，頁 5-10。
[74] 關於新小說的「覺世」目標，參見袁進：《近代文學的突圍》，頁 268-275。
[75] 趼：〈慶祝立憲〉，頁 243-244。

外一方面，在歷經莽夫的高聲疾呼，甲、乙這兩位聽眾卻還是不明白何謂憲政，簇擁皇權、「因循觀望」的態度一覽無遺，在這樣的兩種語言作用下，反而消解了莽夫演說的「覺世」崇高理想。但再進一步觀察，莽夫是否又真的對憲政充滿期待？其言「皇太后、皇上萬歲！立憲萬歲！」已將立憲與皇權連結，對於官員、人民陋習的改革充滿激動與失落，「立憲」能否「萬歲」千秋，顯然達而不言可喻，在這種文字的遊戲中，展露《月月小說》一貫強調的小說趣味本質，並不斷豐富小說文本的意涵，展現對「預備立憲」一事的三種意見。

（二）朦朧／光明之間的國家氛圍

在〈預備立憲〉中，則用了另一種方式來討論憲政體制與國民資格。〈預備立憲〉以一吸食鴉片成癮之人爲敘事者，小說先點出「七月十三，均可稱為吾國國民之大紀念日也」[76]，以示「預備立憲」爲一重要里程碑。然而在大我、國家的重要公眾法令後，隨即出現的事件卻是隔天敘事者小我、個人的煙癮發作：

> 鴉片煙癮屢發，皆不能安然臥於榻上吸食，惟以一種以鴉片原料攙入而製成之藥納入口中，然後飲茶一口，使口中之藥，得藉咽茶之勢送入腹內，以抵癮。雖亦有效驗，然殊不適也。故夜來吸烟，至四時始睡。[77]

煙癮大發的狀態下，不惜吃以鴉片製成的藥物暫時緩解，但仍不夠，吸食鴉片至凌晨才睡。在此我們可以看見主角因吸食鴉片而造成的時間紊亂感。小說更進一步鋪陳這樣的時間「朦朧」意識：

> 不幸為家人所驚醒，已達次日（即七月十五日）之下午二點半矣。朦朧之間，誤疑晨曦何以自西而射於東？呵欠而起，急呼燈來，吾將先過鴉片癮……伸手向小孩索此報，展而觀之，則華文《泰晤士報》也。觀其日，為七月十五，不覺大疑，呼家人問曰：「今日何日也？」家人曰：「七月十五。」吾曰：「嘻！異哉！吾以七月十四日有冗事，不遑食息，才一朦朧，何遂超越一日耶？」此時是醒是夢，吾不能無所疑。[78]

因吸食鴉片而造成時間的無法掌握，一方面正打破了現代性的精確時間感受，正

[76] 偈：〈預備立憲〉，《月月小說》第 2 號，頁 181。
[77] 同上註，頁 182。
[78] 同上註，頁 182-183。

與小說中不斷強調的月、日、時、分造成張力；二方面營造通篇「朦朧」氛圍，將「立憲」放入混沌狀態下討論：

> 自此後數月，吾腦筋中之思想力、記憶力，均不能如前之敏捷。自此時回思彼時之情狀，恍若飲酒醉後，腦筋已亂也。
> 吾於是日日尋繹預備之法，而不可得。蓋吾亦甚樂為立憲國之國民，而依享立憲後之幸福，無如不知預備。吾深懼立憲之後，人人皆為立憲國國民，被陰於憲政之下，惟吾之不知預備者，將獨向隅，吾將奈何？吾將奈何？蓋數月以來，縈繞於吾腦筋之中，如醉如夢者，惟此而已。[79]

立憲、預備立憲等議題在此一鴉片上癮者的「朦朧意識」中不斷被思考，在此，小說營造出一「場景反諷」（situational irony）[80]，致使所有的閱讀者成爲「旁觀者」，而享有一份旁觀反諷的優越感[81]，進一步呈顯出立憲／預備立憲的本質。

在這樣的朦朧意識中對立憲／預備立憲念茲在茲，主角企欲尋得解答，因而出發尋找「志士」，然而在半路上煙癮大發：

> 嘻！幸哉！吾勉強行達二里許，吾身之重心盡失，更不能前。吾方謂今日為吾生最後之一日矣。嘻！幸哉！路旁草屋之外，高挑一商招，吾淚眼朦朧中，猶能辨認其為「冷籠蘇膏」四字。此時吾如落難之人得遇救主，喜可知矣。不暇他顧，即踉蹌入此草屋中……吸過兩筒之後，精神似略壯，始張目細辨，覺此屋黑暗如漆，身手不見其掌，惟聞人語雜沓。不覺暗笑，吾今日何故自投於黑暗地獄？[82]

本來要尋求國家社會的「一絲光明」（立憲）之法，但卻又在矇矓之中「自投於黑暗地獄」，場景反諷在此更推進一步；尤有甚者，主角竟在此煙館中找到一「解預備立憲之術者」[83]，於是兩人便在「一片黑暗」與「氣氛朦朧」的鴉片館中討論如何預備立憲，該人則大發自己高見：

---

[79] 偈：〈預備立憲〉，頁 183-184。
[80] 反諷可簡單分爲「言詞反諷」（verbal irony）和「場景反諷」（situational irony），前者爲反諷家所操持；後者則指某種被當作反諷的情況或事件。參見 Muecke D. C.著；顏元叔主譯：《反諷》（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3），頁 65。
[81] 同上註，頁 48。
[82] 偈：〈預備立憲〉，頁 185-186。
[83] 同上註，頁 186。

> 「自七月十三日明奉上諭預備立憲，吾即盡出囊中資，購買南洋票、湖北票、安徽鐵路票，心中作中頭彩之希望……」
> 吾聞言大疑，蓋立憲為一事，預備立憲為一事，買彩票又為一事，絕不相及者。[84]

究竟買彩票與預備立憲之間有何關聯？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之事，何以讓此人筋疲力盡？該人回答：

> 「夫立憲國之政體，必視所納稅之多寡而輕重其人。故每歲能納若干稅於國家者，乃得有選舉權。有選舉權，始得投票舉議員。又必每歲能納若干於國家者，乃得有被選資格。有被選資格，始得受他人之舉為議員……一旦得為議員，鄉里之人，誰敢不養我鼻息者……故吾此第二之希望，乃欲持吾之選舉權，舉此人為議員也。吾既與之有此數層間接之蒹葭，彼得為議員，吾又為舉主，大可以藉其勢力以自雄。此吾預備立憲之術也。使終不能達吾之目的，吾惟有投身均貧富黨，擴張社會主義而已。」[85]

此人之目標有三層次，首先是在憲政體制內成爲議員；其次是舉主；最下等是擴張社會主義。然而其所欲之目標乃在「致富」與「掌權」上，仍不脫傳統官吏思維，在此明確地表現出「國民程度」與「憲政」之間的落差。憲政思維乃從國外引進，朝廷與民間一部分知識分子企欲移植至中國，小說家開始憂心：中國是否爲一塊適合的土壤？然而這樣的憂心卻是包裹在層層的諷刺之中，面對如此，主角的回應是：

> 嗚呼！閱者諸君，吾聞此人之言，吾數月來如醉如夢之歷史，乃豁然醒。世間有此等捷徑妙法，吾愚，乃昧焉而不覺，今為此人喚醒矣。乃握手謝其人，並算清鴉片之價，疾趨而歸。出吾囊金，廣購彩票，以卜吾之命運何如。[86]

整篇小說的朦朧感受到此得到清整，一掃醉夢之感，甚至連鴉片都不吸，只求先

---

[84] 偈：〈預備立憲〉，頁 187。
[85] 同上註，頁 188-189。
[86] 同上註，頁 189。

達「投票權」資格。層層遞進的場景諷刺在此得到揭示，旁觀的讀者從此「捷徑妙法」中感受到在憲政體制下萬事萬物皆講求「資格」，在現代性下一切都需要「準則」，但是「國民」卻是最缺乏程度的，那麼立憲如何可能？如何預備？此乃小說家透過「預備立憲」此一時事所看穿的人性問題：

> 預備立憲，預備立憲，而國人之見解乃若如此，乃如此！若此者，雖未必能代表吾國人之全體，然而已可見一斑矣。抑吾又思之，若此者，已可謂之有知識之人矣。其於此事相隔一萬重障膜者，猶不知幾許人也。此雖詼詭之設詞，吾言之欲哭矣！著者識。[87]

在此時事的背後，小說家關心的是國民素質的問題，能夠知曉納稅與選舉權並且從中投機者，已算是「有知識之人」，更甚者連此都不清楚爲何。小說家透過「朦朧乃至清晰」的場景諷刺，嘲諷「預備立憲」，更嘲謔「人性」，用惡趣來覺世、遊戲，但小說家實則「欲哭」，朦朧／光明之間，似乎並未因下詔預備立憲而更清楚，反而益加模糊。

（三）神性／人性的隱喻

對於「預備立憲」一事的遲疑，也同樣展現在〈立憲萬歲〉中[88]，這次小說家不再著眼於人／人性上，而是將「預備立憲」此一人爲政策置放於神／神性上檢視其效果：

> 玉皇大帝曰：「昨日值日功曹奏報：下界人皇降下諭旨，預備立憲。朕想人間既已立憲，天上豈可向隅？所以特召卿等商量，務望各抒所見。」文昌帝君奏曰：「不可。我們天上自有天上制度，那立憲的名目係出外國，豈可以用夷變夏？」日遊神曰：「不然。我每日在下界遊行，聽見下界人常說甚麼『天演淘汰，優勝劣敗』，果然彼優我劣，又何妨捨己從人呢？」[89]

將人的世界轉化爲神的世界，除了保守、傳統的夷夏之爭，還有最時興的天演論述，下界／上界的都在同步更新，一同接受新學。那麼人間的憲政體制對神界亦

---

[87] 偈：〈預備立憲〉，頁 189。
[88] 〈立憲萬歲〉故事簡介請參見本論文第二章。
[89] 趼：〈立憲萬歲〉，頁 167-168。

造成衝擊，科舉停辦造成文昌帝君和魁星無用武之地，台灣在《馬關條約》後割讓日本，因立憲國不敬神道，因此造成城隍爺返回天庭候補，更嚴重的還有灶君失業問題：

> 夜遊神拍手曰：「幾個府縣城隍，又算得甚麼？你還不知道，自從台灣歸了日本之後，十幾萬竈君，莫不流離失所，窮得十分可憐。跑回內地來，無可托足，往往餓極了，爬到人家竈突上窺探，等人家的竈君睡著了，卻下去偷冷飯吃。內中只有三四個得著好處的。這三四個跑到上海查一查，見『金隆』、『賽德』、『密采里』等幾家外國飯店是沒有竈君的，他們便各據一家，天天吃大菜。」[90]

神祉的降格肇因於憲政體制下的反迷信，原本在敬神思維下的既得利益者們紛紛在憲政體制內碰壁，只能搖尾乞憐，甚至「損人利己」，煽動兄弟分家，以多口灶。小說透過時事展現出人民在不同程度上的現代化：

> 香案吏曰：「……但不知他們既能盤踞著外國飯店，又為甚麼不仍然盤踞台灣人家呢？」夜遊神曰：「豈不聞下界人言：『信則有，不信則無。』台灣人降了日本，受了日本人教化，全都不信了，所以他們也不能立足了。」香案吏曰：「此話不足信，難道上海外國飯店便信神道的麼？」夜遊神曰：「這又不然。外國人雖然不信，然而所用的廚子都是中國人，他們心中時時有個竈君在裡面，所以便可乘隙而入了。」[91]

迷信與否仍在於人心，而人心則需依靠教化，若只是外表上的西化是不足以破除迷信的。除了立憲、破迷等當時社會風行的概念外，「革命」也入了此則小說當中。神仙的座騎們企圖阻饒「五大臣」出國考察，便派天聾去南洋找申公豹：

> 申公豹大怒曰：「我在這裡運動革命，管他立憲不立憲？你們左右是個奴隸罷了，愁些甚麼？」天聾曰：「我們何嘗不努力，只是想不出法子來。」申公豹大聲曰：「我是罵你們奴隸，不是叫你們努力。我是革命黨，沒工夫和你們談這個。」天聾曰：「你只知叫我們努力，又焉知我們不努力？」

---

[90] 趼：〈立憲萬歲〉，頁 168-169。
[91] 同上註，頁 169-170。

[92]

我們可以將這些人物一一編碼，天聾、地啞正體現出當時守舊派的狀況；申公豹這位口才很好的人成了革命黨員。但必須注意的是，當天聾與申公豹這兩大主張碰撞時，其不能相知的狀態。革命主張的「大怒」、「大聲」咒罵奴隸，卻成了守舊主張「裝聾作啞」轉譯上的誤解。守舊主張「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企圖，卻是落得「不能溝通」的下場，這「聾啞」的「天地不全」樣貌，以及聲嘶力竭的「沒工夫」，兩相消解，無力可施，反而呈現出一種荒謬的、滑稽的笑點。另外，申公豹在《封神榜》中本為支持殷商，反對周之攻打，吳趼人有意扭轉如是安排，將其轉為革命黨員，或可視為諷刺當時革命黨員遊走各地，奔相走告，需要「口舌」能力的狀態。

然而真正最具諷刺性與遊戲性的則是小說結尾，眾畜牲閱讀《天曹官報》的報導：

> 諸神卿議定，此外不再更動，諸天神佛，一律照舊供職，今晨入奏，玉帝已經允准，定於明日早朝，再降玉旨。故今日散朝時，通明殿上，一片歡呼之聲，皆曰：「立憲萬歲！立憲萬歲！」[93]

所謂的立憲是「一律照舊供職」，無怪乎眾畜牲們以為：

> 「原來改換兩個官名就叫做立憲，早知如此，我們前次放七返火丹未免多事了……據此看來，我們的飯是不必多慮的了。」群畜聞言，不覺一齊大喜，亦同聲高呼「立憲萬歲，立憲萬歲！」[94]

不論是贊成立憲的神佛，或反對立憲的畜牲，在最後宣布立憲結果卻是殊途同歸，「同聲高呼」萬歲，祈求憲政綿延，並給予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憲政高度認同。各懷之鬼胎皆得安定，先前的爭執、較勁，也在這樣的憲法下達到共識，無怪乎要「皆」曰萬歲！在此結尾乃一強烈的「場景反諷」，在這種修辭策略下，不但

---

[92] 趼：〈立憲萬歲〉，頁 172-173。
[93] 同上註，頁 188。
[94] 同上註。

消解了先前兩派人馬的緊張感，更讓這種「共識」顯得可笑，呼應了小說家最深層的心情——「吁嗟乎新政策」[95]。

（四）時間推延的預視

對於清廷實際立憲的狀態，在〈光緒萬年〉中著墨甚多：

> 自從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詔天下臣民預備立憲，於是在朝者旅進旅退，揖讓相語曰：「立憲，立憲。」在野者晝眠夕寐，引頸以望曰：「立憲，立憲。」在朝者對於在野者曰：「封」、「鎖」、「拿」、「打」、「遞」、「解」、「殺」——立憲立憲；在野者對於在朝者曰：「跪」、「伏」、「怕」、「受壓制」、「逃」、「避」、「入外籍」、「掛洋旗」——立憲立憲。如是者，年復一年，以達光緒萬年。[96]

小說呈現出在朝／在野對於立憲的兩種態度，顯然皆非良善。在朝者仍不斷施壓；在野者則屈服其威或逃入租借，尋求外國司法權的庇護。這是時事與當下社會狀況的描繪，然而小說以此爲起點，更進一步拉長時間向度，到了「光緒萬年」，並且強調「如是者，年復一年」的狀態，顯然，「立憲」對於中國原有的社會狀況並沒有改變，也隱含了憲政體制並無法改變在朝／在野者的思維方式、生活狀況。

在這樣的前提下，小說出現了「彗星撞地球」的事件，「偉人」觀察天象，發現異狀，並不斷地藉由現代化的科學儀器、知識測量：

> 初見彗星逕對赤道下而來，其體積較地球大十二倍。
>
> 越數日，再測之，彗星之愈近，且由赤道逐漸北移，自赤道漸入於北緯十度之位；又漸入於二十度之位；久之，乃入於三十度之位。
>
> 既而此彗星愈趨愈北，自北緯三十度，漸入四十度、五十度、六十度，以

[95] 此語乃註明於小說題目下。據林明德研究指出，吳趼人並不反對立憲，其所反對的是「假立憲」的措施。另其研究亦指出此篇小說援引的時事：1906 年革命派的吳樾炸五大臣於北京車站一事。參見林明德：〈論晚清的立憲小說〉，輯入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頁 143-144。

[96] 我佛山人：〈光緒萬年〉，《月月小說》第 13 號，頁 115。

至於八十度。[97]

對於天文科學的認識，促成了「偉人」之所以與「大眾」不同之處，在這樣的觀察下，偉人越來越緊張，而其對比的是大眾的無知無覺與「不足信」的評論。在文本中我們可見偉人／大眾此二元呈顯出的唯一／多數、緊張／無感的對比結構，而透過這樣的結構所生產出的是對於立憲國民資格的一種強烈反諷。到了最後，由於彗星撞擊地球，造成「東西轉矣，然而已移北極於南極矣」[98]的結果，而這樣的結過卻是讓國家井然有序，且實行立憲。對比先前國民的渾渾噩噩，至如今精神煥發的狀態，文本提供此對比更加提點出了國民性的問題。另外在文本內外也有一二元對立：文本內爲光緒萬年，文本外的閱讀當下時刻爲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除了一種時間推移的想像外，此一結構更揭示了當前預備立憲的荒誕與不可能。

二、對國民性／資格的商榷

從這些小說看來，小說家對於當時國民性和國民資格有著極深層的憂心，這些焦慮在〈大改革〉與〈黑籍冤獄〉中更表露無疑。

（一）戒賭、戒嫖、戒吹：「改革」的轉喻遊戲

〈大改革〉以作者爲敘事者，講述其有一朋友，家財萬貫，但卻沾染「嫖、賭、吹（抽鴉片）」三種惡習達幾十年，敘事者勸誡朋友要改多次，但無奈沒有成效，一日這位朋友突然像敘事者表明自己已「大改革」了。

小說開頭先敘述這位朋友是如何染上此三種惡習：

> 他從小就犯了一個毛病，是喜歡賭，起初不過是新年裏擲陞官圖、搶狀元圖頑頑，到後來新年過盡，大家都要幹正事，沒工夫和他頑了，他閒著沒事，便想要賭，就有那不尷不尬之人，領他到賭館裏去……我這朋友，自入賭館以來，一來連輸了好幾天，把他氣的了不得。那尷尬人知道他氣急了，便設法舒他的氣，又把他帶到妓寮裏去……從此改行不賭了，終日花

[97] 我佛山人：〈光緒萬年〉，頁 117-118。
[98] 同上註，頁 120。

> 天酒地，結交一班酒肉朋友，嫖過幾時，總想翻本，於是又帶了銀錢往賭館而去，誰知又輸了個大敗而回。
>
> 回到妓寮，未免悶悶不樂，那粉頭巴結他，同他解悶，便燒鴉片給他吃……吃了好幾個月，不好了，居然不吃他不行了，上了癮了。[99]

從這段敘述來看，賭／嫖／吹實乃密不可分的陋習，彼此互相雜染，且若長期處在這種環境中，想潔身自愛也難。然而面對朋友這樣的惡習，敘事者也只能予以勸告，但這位朋友卻以這是他的「自由權」爲由，不予理會。賭、嫖、吹／自由權的對照，可見上海現代化後惡／善的一併輸入結果，在國民資格尚未成熟的狀態下，善／惡的對比並不明確，也沒有一定標準，甚至在話語的操作下，善／惡亦有顛倒的可能。

小說先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善／惡對比，而當敘事者再度遇到這位朋友時，文本又出現了一改革／墮落對比反諷修辭：

> 他道：「不、不，我已娶了親了。」我驚道：「失賀啊！是幾時的事？」他道：「我有錢也送到錢莊上去了。你說我還吸的是鴉片烟嗎？正是依了你的話，吃滋補藥呢！」[100]

但他所謂的「大改革」，隨著小說的鋪陳逐漸地揭開真相：

> 我道：「這明明是鴉片烟，怎說是滋補藥？」他道：「朋友，你有所不知，我自從聽了你的話，就請教醫生開了一個方子……西潞黨、棉黃芪、野於朮等等攙在大土裏面熬出來的，這不是滋補藥嗎？可是烟味淡了，從前吃二兩的，此刻要吃二兩五錢纔過得癮了。」[101]

將補藥／毒品混爲一，以前這樣就是在「滋補養身」，結果需求量反而比從前更大，在此小說文本已由「大改革」一詞引出一次轉喻（metonymy）活動，透過這種「戒毒滋補」的言詞反諷（verbal irony）揭露出「事實與表象間的對比」[102]，

---

[99] 趼：〈大改革〉，《月月小說》第 3 號，頁 149-150。
[100] 同上註，頁 152。
[101] 同上註，頁 152-153。
[102] Muecke D. C.著；顏元叔主譯：《反諷》，頁 39。

進一步引起敘事者對另外兩種惡習戒除方法的疑問：

> 近黃昏了，他吃過了烟，忽然在抽屜裡取去一百元銀，道：「這是要送到莊上去了，朋友你可要高興，陪我去走走。」我道：「此時錢莊早結了帳，如何還可以送去？」……忽然裏面燈燭輝煌、人聲嘈雜，抬頭看時，當中一張桌子圍了一大堆人，他也擠了進去，甚麼青龍啊、白虎啊、出門啊、進門啊，一陣胡鬧，便空手擠了出來，對我說道：「存下了！」我道：「這明明是賭館，你賭輸了，還說存莊嗎？」……他回頭道：「你看這不是錢莊招牌嗎？」我在燈光之下抬頭一看見是「有進莊」三箇字，他便說道：「……我便想了一箇法子，叫他們貼了這個招牌，從此我只認定這一家來賭，賭輸了只當是存款，賭贏了便是支款，這不和錢莊一樣嗎？」[103]

就前次的修辭策略觀之，此事件乃前次事件的隱喻（metaphor）修辭[104]，錢莊／賭館的對比在此人用心安排下成了同一處，再度揭示了事實／表象之間的對比，第一次敘事者面臨這樣的對比其情緒爲期待；第二次則被氣得頭昏眼花。在此已可見此人並非真正的改革，反而有魚目混珠之嫌，在這樣可被想像的狀態下，小說文本展開最後一次轉喻活動：

> 他笑道：「我的家眷住在這裡，你進來坐坐，我叫內人見見你，你看這門楣上不是貼著我的公館條子嗎？」我再抬頭，果然不錯，但是公館條子旁邊還有三四箇窄長條子……我最觸目的是一件東西，你道是甚麼，是一張紅木大床，不覺愈加驚疑，暗想他如何引我到臥房裏來了……我心中不覺恍然大悟，這裏是妓寮，只聽得我那朋友道：「這便是內人。」我此時神魂不定，覺得無限蹺蹊。[105]

因室內陳設而引起敘事者的疑惑，小說在此進入尾聲，所謂的「大改革」話語究竟爲何？文本接續這樣的懸想繼續闡述故事：

> 他又說道：「……這個是我四五年的老相好，我因想了個簡便之法，從此

[103] 趼：〈大改革〉，頁 153-154。
[104] 一種由於等而視之在兩個不相同的事務之間建立相似性的修辭手法。參見 Cohan, Steven（史蒂文・科恩）, Shires Linda M.（琳達・夏爾斯）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頁 29。
[105] 趼：〈大改革〉，頁 155-156。

> 我改口叫他老婆，他改口叫我老公，把從前所用的丫頭、老媽子辭了，兩個另外用兩箇曾經在公館人家幫傭過的，叫我老爺，叫他太太，門外又貼了公館條子，你看我這不是居然成家了嗎？不是大改革了嗎？」[106]

成家／嫖妓，公館／妓寮，小說的言詞諷刺在此已進行了三次，小說透過了對事件的「安置（placement）—移置（displacements）—置換（replacement）」[107]的基本結構，透過相似性的聚合關係來安排這三次改革事件，徹底揭示了「大改革」話語狀態，該友人的大改革原來不過是改換名稱，從形式著手，內涵仍不離嫖、賭、吹。因此，敘事者最後的態度則是：

> 咳，我聽了他這一席話，一氣一個死，原來這樣就是他從諫如流的大改革了。算了，完了，我也不說了。[108]

從一開始的戒菸／期待，到中間戒賭／被氣得頭昏眼花，到最後戒嫖／憤怒到無言的狀態，朋友／敘事者之間巧妙的對比結構正呈現出此「大改革」的移置軌跡，而最後達成對「大改革」一置換，也就是大改革的實際話語與敘事者對「大改革」此一符號的所指想像之間的背離狀態。

而在小說的敘事結構外，有一卷末評點，其言：

> 悵懷時局，無限傷心，詼詭之文，憂時之作也。吾展讀一過，欲別祝以嘉名曰「立憲鏡」。[109]

由此評點觀之，此小說乃眼見時局而作，其言詞雖詼詭，卻飽含情感。論者以為可另名「立憲鏡」，此名稱可有兩種意涵：首先，以立憲為鏡，其中映照出的正是國民素質的低落，跟不上憲政的腳步；其次，此小說亦可為清廷立憲之鏡，藉

---

[106] 趼：〈大改革〉，頁 156。
[107] 此一結構為敘事學上觀察事件的聚合關係結構，其建立在後結構主義的思維下，認為通過此一結構，故事將時間表現為在敘事空間（組合段）裡的一種運動（持續），以獲得一個聚合關係事件（作為一個能指的開端）向另一個聚合關係事件（作為那個開端的所指的結局）的轉化。參見 Cohan, Steven（史蒂文・科恩）, Shires Linda M.（琳達・夏爾斯）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頁 71。
[108] 趼：〈大改革〉，頁 156。
[109] 同上註。

由立憲而大改革，但卻若從形式著手，內涵不變，則仍徒勞。由此可見「立憲鏡」一名展現出的「立憲」雙重性。

（二）冤魂的現身說法：對癮君子的勸說

〈黑籍冤魂〉則是敘事者聽完演講後，在路上遇見一將死之人，該人將其自述一生的筆記託付給敘事者，敘事者將其照錄出，遂爲此小說。該回憶錄書寫自己染上鴉片煙癮後，家破人亡，甚至自己身染重病之事。而其會染上煙癮則是因爲自己父親教唆：

> 當他聽了他人的說話，說上了鴉片煙癮的人便無嗜好，也不嫖了，也不賭了，最是保守家產的善法。因此我十五歲上，我父親便教我吃上了鴉片煙癮。[110]

由此段文本可見當中的言語（parole）衝突，煙癮／善法之間的對舉頗具巧思，將吸食鴉片成爲「必要之惡／善」，甚至是「保守家產」良方。小說在此將煙癮置入了家庭關係當中，於是小說文本接下來也就繼續專注於吸食鴉片在家庭空間中的展演：

> 醫生仔細察驗一遍，實在看不出是甚麼病，「或者小孩子吃錯了甚麼東西，中了毒，是說不定的。」……我忙到房裡拉出一盒參片，打開了灑了一屜子，準定是小孩子當他是餅吃在肚裡去了。連忙施救，一面請陳與昌，一面請外國醫生，誰知竟來不及了，一條小性命就此送了。[111]

原是爲了保守家產而染上煙癮，卻致使自己兒子喪命，後繼無人。尤有甚者，其妻亦吞其鴉片自殺，以表達對其煙癮之不滿。少了女主人的管理，家庭內外一切大小事皆混亂，甚至連家產都敗光了。故事發展至此，形成一巨大場景反諷，保守家產／家破人亡的對比鮮明，家庭空間此時已成破落之處，而這全由「鴉片」轉喻而來。

之後因沒錢只得將小女兒送給人當養媳，該人得到「賣女」的五十錢後，竟

---

[110] 趼：〈黑籍冤魂〉，《月月小說》第 4 號，頁 158。
[111] 同上註，頁 160。

然還是沒有奮發向上戒除菸癮，反而愈發墮落：

> 我得了五十元錢，便不吃土皮了。買了一雙新鞋子，一件半新的青布長衫，到麥家園綺園煙館吃清膏去了。吃上兩箇月，洋錢用完了，那箇堂館卻也熟了，便欠帳起來……回頭一看，卻是一個野雞妓女，在那裡拉一個過客，細看那野雞妓女時，不是別人，正是我那收房的大丫頭……我留神對那小清倌人一看，不覺大驚，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女兒。[112]

拿賣女所得大抽鴉片，由「土皮」改爲高純度的「清膏」，甚至連外表都改換更新。然而此時卻發生與兩個女兒相遇的事件，收養的大女兒成了野雞妓女，親生女兒成了小清倌人，從養媳轉變爲小清倌人；從保守家產轉變爲賣女求財，這些都是起因於「鴉片癮」，而導致家庭空間不可逆的破滅。而因此人與女兒相見，企圖相認，致使被毒打，而他以拉車爲業，其車也被偷，可謂是雪上加霜的情節：

> 當夜我也不敢回車寓裡去，只得到老北門城門洞裡挨了一夜，到了次日，我便得了個傷寒病，又下烟痢。[113]

該人日記節錄至此，小說再度轉回原本的敘事者「我」，其旁觀這位死於路上之人的一生，多所感嘆：

> 但是他寫到得病以後，便沒了，到底如何鬧到死在路上，那卻無查考了。並且後半段的字歪斜愈甚，幾於不可辨認，想是得病以後寫的了……誰知吃煙的人到此地步還不肯戒，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所以特地表他出來，也算是勸人戒菸的苦口，並且也不枉那路倒屍現身說法一場。[114]

透過冤魂的日記「現身」來對看不見的廣大吸食鴉片者進行勸說，全部歷程皆聚焦於「家庭空間」的散敗，透過「鴉片」進行一連串的轉喻，而最終強調後繼無人、女兒變爲妓女、乃至死於街頭的潦倒光景。此冤魂之所以「冤」，正是在其被鴉片所害，至死不解，其巧妙地凝聚於鴉片對於個人、家庭的負面影響，此乃與每個人最切身關聯的生活狀態，即便該人確實不賭不嫖，只抽鴉片，卻也落拓

---

[112] 趼：〈黑籍冤魂〉，頁 164-165。
[113] 同上註，頁 166。
[114] 同上註。

至此，可見小說家對於當時吸食鴉片對於國民性的戕害，以及對中國人生活影響之深的觀察、體悟。

三、「立憲」作為一種思考方式

春颿的〈未來世界〉，標明爲「立憲小說」，也是唯一的一篇以立憲爲分類類型的小說，其將諸多當時的社會狀況、問題：家庭、男女、法政都置入時事「立憲」下來思量，書寫立憲背景下的社會轉型。在首回，就先對當時的立憲／革命路線之爭的問題進行議論：

> 專制有專制的時代，立憲有立憲的時代，民主有民主的時代，須要看著那國民資格方纔好定那變法的規模。你想如今那一班守舊的黨魁只曉得保守政權，偏重君黨；一班維新的首領又只曉得大言革命，伸長民權。其實他們說的都還是些皮毛上的話兒……總而言之，無論如何，先要有了這般的資格，方纔能做那樣的事情。[115]

面對當前的路線爭執，小說家跟隨了嚴、梁的思維，選取調和路線，將重點取決於「國民資格」，不論立憲還是革命，都要有完善的配套國民性方能實現，政體不過只是順應國民資格而已。至於對於清廷下詔預備立憲一事，其亦提出看法：

> 方今百度維新，破除積習，宣佈立憲，中外皆知。我們中國的一班志士聽見了這個信息，一個個互相傳說，歡喜非常。只說立憲之後，我們中國一定可以奮發自強的了。殊不知立憲的這個事情，不是憑著那政府的幾個大老，外省的幾個重臣，就可以自由自便組織這個憲法的。要叫那天下二十二行省，全國四萬萬同胞一個個都曉得自己身上有對於憲政的問題，有贊成立憲的義務，成了個完完全全立憲以後的國民，這纔算得是立憲，這纔算得是自強。[116]

由此可以觀察以小說家的角度，所理解的「立憲」應是全民運動，從問題出發，到明白義務，最終成爲立憲國民，其點出步驟，正是希望讀者／國民能夠體悟出

---

[115] 春颿：〈未來世界・第一回 恣讜論反觀立憲鏡 噴熱血呼起中國魂〉，《月月小說》第 10 號，頁 147。
[116] 同上註，頁 149。

立憲，或說政治問題，其實是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因此這正呼應其回目名稱「呼起中國魂」的用意。

從第二回開始，小說文本開始建構一立憲後的「未來世界」，小說家與政治家的不同從此看出，小說可以「想像」，可以有一「未來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民智逐漸開通，民權亦逐漸發達，甚至發展成「帝國規模」。然而，仍有五六成的人民尚處於閉塞狀態，也有官吏還是半舊不新之人。面對這樣的國民狀態，文本世界中提出了希望：

> 我們中國立憲之後，雖然事事改良，那立憲的規模卻還沒有十分完備。不過就著那一班贊成立憲的國民比較那一班崇拜君權的蠢物占個多數少數罷了……但是我們國民既然有了自治的精神，具了文明的思想，那以前社會上的那些野蠻腐敗的地方，自然也就慢慢的改良過來。[117]

在這未來世界中主要有兩類型的人，代表過去腐敗、野蠻、崇拜君權、閉塞之人，以及代表未來／當下進步、發達、贊成立憲、開通之人，而必須由後者來慢慢改良前者，進而達到全民皆具備立憲國民資格，社會也就完美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有一個完美典型出現在文本世界中，他具備了以西方／新知／現代化觀點下的所有優點：

> 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生，叫做陳國柱。是個時下大名家，學貫中西，兼通物理、聲光、化電，無所不通；東西文字無所不習，最專門的是英、德、法三國的語言文字。更兼備俠氣凌雲，熱腸照日，身材奇偉，骨骼魁梧，真是個愛國的好男兒，熱心腸的大豪傑。[118]

不難發現此人正是當時社會狀態標準最爲「流行」之人，從日本留學歸國，通習格致之學。但此人也與小說中經常諷刺的「徒具形式」的留學生大不相同，其具備了真才實學，甚至精通三國語言，抓緊了對他國文化的最基本認識工具，可見

---

[117] 春騷：〈未來世界・第二回 陳國柱演說警同胞 郭殿光家庭爭教育〉，《月月小說》第 10 號，頁 151-152。
[118] 同上註，頁 152。

其學問之扎實。他還具備了俠氣熱血，認爲自己有改造社會之責，不負其「國柱」之名。陳國柱週末便展開演講，而在其演講的薰陶下，展開了此立憲未來世界中的第一個社會轉變情節——家庭問題的關照。

（一）公／私領域的跨界

郭殿光與乃父郭中秀正是當時中國的兩種典型人物：郭殿光曾入學堂接受過短暫的教育，「那些文明、野蠻、自由獨立的口頭禪早已練得爛熟」[119]，但其實對於新知仍是「一知半解」；郭中秀則是當時社會上新興的商業階層，熱衷於賺錢，對於新學以及社會漠不關心。當「立憲」進入郭家後，郭殿光／郭中秀有不同的應對方式，前者渴望進一步地認識，後者則絲毫不以爲意，依然以過去的習慣生活，兩人因此產生爭執，並且堅持自己一貫的準則：立憲新知／君權專制彼此爭論：

> 郭中秀……只聽見兩句話兒，什麼中國的主人翁，又是什麼抱持著一面算盤，做個金錢奴隸。一時間解錯了他兒子的意思，只道兒子在那裏罵他，說他是個奴隸……「你這個混帳東西，連我老子都罵起來了，這還了得，難道沒有王法的麼……」……越想越氣，搶上前去，把郭殿光胸前的衣服，一把扭住，舉起手來，劈面就是一巴掌……（郭殿光）道：「……你可曉得，現在是立憲的時代，不論父子兄弟個人都有自治之權，就是父母教訓兒子也有個勢力圈的界限斷……若是父母不叫兒子讀書，就是做父母的放棄天職；兒子不肯讀書，便是做兒子的放棄天職。要照著你這樣的野蠻舉動，還成個文明國度的人麼？」[120]

由郭中秀／郭殿光的爭執可以看見舊／新之間的對話狀況，當郭中秀強調過往認知中的父子／王法制度；郭殿光卻拿出自治／立憲的新論述，當新學／新文化價值進入家庭空間、父子倫常關係中，反而成了野蠻／文明的判準線，取代了過去「血濃於水」的思維模式。家庭空間已不再是由親親推導出尊尊的法則，而是也使用與社會、政治場域相同的「天理／律法」則條。

於是本屬於家庭空間內的父子爭執，演變爲對簿公堂的情節，當家庭內部的

---

[119] 春騷：〈未來世界・第二回 陳國柱演說警同胞 郭殿光家庭爭教育〉，頁 155。
[120] 同上註，頁 156-157。

父／子問題延伸至外部的司法空間處理時，自然有新的角色加入推動情節。此處小說出現了一知縣，其比郭中秀更爲守舊，內心根本不願立憲，但因貪戀權位，只得學些新名詞當口頭禪，敷衍一番，「這立憲的兩個字是怎樣的意思，如何的道理；做官吏的應該怎樣的代表憲法，他這糊裏糊塗，沒有曉得呢！」[121]於是小說開啓了父／子在官吏、司法空間內的對比狀態，首先面對縣令的態度即有很大的不同：

> 郭中秀上堂跪在地下，連頭也不敢擡一擡；郭殿光恰止行了個鞠躬禮，站立一旁。[122]

此父／子之間的對比完全凸顯出對於「立憲」接受、了解與否，也是立憲前後的對比，更是反映出了當時初立憲時的青黃不接之狀態。

而當郭中秀、郭殿光分別表述自己的立場後，文本開始轉到更爲守舊的縣令和接受過兩年學堂教育的郭殿光之間的對比：

> （縣大老爺）向郭殿光道：「……他是你的父親，你是他的兒子，為什麼好好的他要送起你的忤逆來？照這樣的看起來，你平日之間沒有為子之道是可想而知的了。本縣就據著這個，定你的罪名……」（郭殿光）道：「這可想而知的四個字就可以據著定讞的麼？要曉得如今是立憲的時代，無論什麼裁定的事情都要拿著了有罪的真憑實據，或者有一個確鑿的證人方纔好下那最後的裁判。老公祖把『可想而知』四個字要定我的罪名，那還成個文明國度的舉動麼？老公祖是個代表憲法的人，若是違背了憲法就是放棄自己的責成，要像這樣的做下去，若是給上頭曉得了，只怕於老公祖也有些不便罷！」[123]

在司法空間中，縣令／郭殿光的對比愈強烈，前者更爲迂腐，後者更爲新穎，可想而知／真憑實據的結構，點出了對立憲的不解／了解，過去的倫理判準於此已不適用，立憲後強調的是犯罪的證據，而憲政體制正爲文明與否的劃分標準。文

---

[121] 春飆：〈未來世界・第三回 郭中秀怒控侵兒 錢塘縣糊塗斷案〉，《月月小說》第 11 號，頁 143。
[122] 同上註。
[123] 同上註，頁 144-145。

本採用了相似的聚合原則，將角色屬性替換而形成新的對比結構，例如本爲郭中秀／郭殿光，在此則爲郭中秀／縣令的二元結構，而縣令比郭中秀、郭殿光還不懂憲法，如何爲憲法的代表人？此一場景諷刺，也暴露了對當時不知進取的官員的批判。

郭殿光憑著自己在兩年的學堂教育，成功擊退了司法體制內和家庭空間內的掌權者，然而郭殿光對憲政／文明／進步了解與觀察，卻在理想典型人物陳國柱前產生了滑動：

> （陳國柱）道：「……但這些平權自由的話頭，是稱那國民的團體要叫全國的同胞明白了這個道理，曉得世界上的人種一個個權力平等，一個個可以自由，所以結成了團體去反對那非理分外的欺凌，並不是叫你在家庭之內實行平等主義的……殊不知外國的家庭專制比我們中國還要利害些兒。」[124]

陳國柱的論點清楚地將公共／私人、政治／家庭區分開來，並認爲「平權、自由」是國民語言，而非親人語言，並以爲外國家庭比中國更專制。由此觀之，憲政體制並不應該進入家庭空間中，立憲乃屬公領域，並不適用私領域的部份。不過陳國柱亦對郭中秀言：

> 「你兒子的意思委實不差，不過他那種神氣、那種樣兒，不該對著父母使出來……將來你兒子做了官，你就是一位現成成的老太爺了，為什麼不叫他進學堂……你可曉得如今學堂裏的學生是天字第一號最貴重的人物。」[125]

如此看來十分「迂腐」的思維，何以會從完美人物口中說出？原來是陳國柱早已發現郭中秀爲一「蠢如牛羊，膽如鼷鼠」之人，於是誘之以利、曉以大義一番，自然成功說服郭中秀。小說在此進一步成功塑造陳國柱的「理想」狀態，其面對這對父／子代表的整個中國文化狀態，皆能成功遊說，使之往「公理」靠攏。雖說立憲無法進入私領域，但只要是懂得變通的紮實學新學之人，一樣可以有效解

---

[124] 春騷：〈未來世界・第三回 郭中秀怒控侵兒 錢塘縣糊塗斷案〉，頁 147。
[125] 春騷：〈未來世界・第四回 姚小石賄賂作鄉官 馬德生恃強佔民地〉，頁 149。

決家庭紛爭。

而當象徵迂腐、退步的郭中秀與縣令都被說服、解決後，小說接下去安排了陳國柱與郭殿光談論新學的事件，由此事件中，我們可見陳國柱／郭殿光的對比，顯現出真才實學，與徒耍弄新名詞之間的距離：

> 陳國柱見郭殿光滿口的新名詞，開口閉口總離不了這句說話，以為他的學問一定是好的。便盤問盤問他的專門學問。誰知郭殿光通共進了兩年學堂，除了學會這幾句口頭的說話，此外的學問竟是一點根底也沒有……（陳國柱）道：「……這些開口平權，閉口自治的話是學堂裏頭的通病，好像要把個學堂學生的招牌掛在面上的一般，其實不就是學堂出身……你通共進了兩年學堂，學生的應該有學問一樣都沒有學全，卻單單的學了這些口頭上的說話，學堂的好處沒有得著，倒沾了一身的學堂習氣。」[126]

在陳國柱／郭殿光的對照中，明顯看出兩人不同，「學堂習氣」正顯現出當時教育界的問題，當「知識」成爲招牌，進而讓學生自我標榜的同時，新式教育的問題自然也就浮現——沒有根底的學問。這不只是出現在立憲後的「未來世界」中，事實上《月月小說》的諸多小說也多對此現在有許多諷刺與反思。[127]

（二）立憲下的三種男女婚／戀狀態

除了父／子私領域與情感在「立憲」此一座標中的滑動外，〈未來世界〉也將男／女交往放入「立憲」的座標系中重新描述與定義。汪墨香是當時接受女學的典型女性：

> 家資富饒，學問淵深，門第清華，性情和藹，卻又生得芙蓉如面，楊柳為腰，遠岫輸眉，秋波遜眼，春雲態度阮凌華，絕世之姿，秋月丰神，薛瑤英勝衣之真骨，真個是傾城傾國，宜喜宜嗔。[128]

---

[126] 春颿：〈未來世界・第四回 姚小石賄賂作鄉官 馬德生恃強佔民地〉頁 151。
[127] 如前揭之〈無理取鬧之西遊記〉、〈立憲萬歲〉、〈新封神傳〉、〈新鏡花緣〉、〈上海遊驂錄〉等等皆對留學生、新式學堂學生有諸多質疑，將其描繪爲只注重表面功夫之徒。
[128] 春颿：〈未來世界・第七回 學改良暢談社會 阻進步痛罵愚傖〉，《月月小說》第 13 號，頁 51-52。

這是相對於陳國柱的男性理想人物，爲當時女性的理想型態的設定：有才有容，內外兼俱，並且家世清白。這樣的完美女性在男女交往上又是如何？在其與夏沛霖一見鍾情的描述中可見一二：

> 汪墨香卻自己心上詫異道：「我一向也在交際場中，和一班男人聚在一起，從來沒有動過心，怎麼今天遇見一個路過的人，就這樣的激刺起來？」……忽見門上人傳進一個名片來，說是一個學生，在外要見小姐……原來這個時候，都學那歐洲各國的風氣，一班紳士家的婦女，都在交際社會裡頭隨意應酬，不論男女，都好直接結交。絕不是那以前的那種樣兒：婦女見了客人遮遮掩掩的，做出那一付的嬌羞態度，旖旎丰神，給男人們看了把他們當作一件玩物。這也算是中國近年來女學的進化。[129]

除了知識更新外，男女交往也隨著民智、風俗的轉變有了不同。可以自由（隨意應酬）、平等（直接結交）、公開（交際社會）的交際，並視此爲「進化」，可見當時一切以西方爲標準的情狀。在立憲與維新的相關作爲下，男／女人格與交往皆發生了轉變。

而汪與夏的情投意合，進而要結婚，卻惹來汪的追求者——潘澗泉和陸紫岑的嫉妒。此二人亦爲「高等學堂的卒業生」，但面對理想典型汪墨香卻有著傳統價值觀的評論：

> 潘澗泉道：「……他仗著自己的才貌，又當著如今的時代，免不得在交際社會裏頭隨意結交，任情酬應。我們哪裏禁止得住他？況且從古以來，有才有貌的女子，都是風流放誕的性情，萬一將來出了什麼亂子，我們又哪裏防備得盡他？」[130]

即使是高等學堂卒業生，亦不免排斥這種男女公開的社交活動，女子才貌雙全，加之以當前時代氛圍，男性即使想阻攔亦無力爲之。將女性的能力視爲「風流放誕」，新與舊思想之間似乎沒有那麼容易受到教育的洗禮。

---

[129] 春騷：〈未來世界・第七回 學改良暢談社會 阻進步痛罵愚傖〉，頁 53-55。
[130] 春騷：〈未來世界・第八回 珠光劍氣緣訂三生 怨柳嗔花波興一顧〉，《月月小說》第 13 號，頁 62-63。

究竟立憲對於男女交往狀態是好是壞？小說出現另外一段男女關係，與汪、夏對照：趙素華具沉魚之姿，又在美國得到大學堂的卒業文憑，之後在倫敦、巴黎、長崎、東京各處遊歷，後來在一演說場合上與美少年黃陸生一見鍾情。男女交往進入救國的演說空間中，卻是「電光石火」一般，此情節安排頗具趣味，文明啓蒙退位讓給兒女私情，公／私之間的界線不再明確，甚至有助長之效用。而就在這樣並不清楚對方的強烈吸引下，兩人有了結婚的念頭，然而光憑藉外在的吸引是不夠的：

> （趙素華）覺得這個人性格溫存，風神都麗……黃陸生又對著趙素華說自己是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堂的卒業生。趙素華聽了待他更是十二分的親熱。[131]

這是趙素華眼中的黃陸生，外貌佳、個性好，重點還是個留學生，這是當時最典型的「才子佳人」。然而小說卻在後頭補述了黃陸生的實際狀態：

> 黃制臺生了這個兒子，把他當作寶貝一般，真個是掌中擎著，口中含著，連大氣兒也不肯呵他一口。慣得個黃陸生的脾氣，非常舛僻，除了父母之外，隨便什麼人也不放在心上。一句話說不對，立時立刻的倒插了兩只眼睛，暴跳如雷，有時一個不高興，連父母也要教訓兩句……連學堂都不肯教他進去，只說他身體不好，恐怕多讀書了壞了身。[132]

從性格溫存到舛僻、暴跳如雷；從本東京法政大學堂的卒業生到連學堂都沒進，黃陸生的真實狀況顯然與戀人所見到的條件相去甚遠。在這樣的補述下，其實正預述了兩人婚姻的不美滿，也顯示出了雖然男女交遊更爲自由公開，卻也可能造就許多怨偶，單憑外在條件以及平等、自由、公開的交往，或許並不能使男女交往更加深入。

小說在描述趙、黃的交往時，遠比汪、夏的敘述更爲詳細，並且更加強化其「進化」的交往過程：

---

[131] 春騷：〈未來世界・第十二回 趙素華酒肆敘幽情 黃制軍晚年生幼子〉，《月月小說》第 15 號，頁 94。
[132] 同上註，頁 95。

> ……便要照文明結婚的辦法，什麼親迎、奠雁那些腐敗禮節一筆勾銷，免祇選近些一個日期，要與趙素華依著現實改良婚禮，成為夫婦。[133]

這就是戀愛的「文明進化」，西方「自由結婚」的方法，連婚戀都符合「革新」思潮，這樣是否真能得到幸福？立憲本爲政治面，如今卻連兒女私情都隨之改「良」，然而小說顯然是對此存有疑惑，因爲即使男女交往更爲透明化，趙素華卻還是只能在婚後才發現黃陸生是個「詞章不通，科學不懂」的騙子。

面對不學無術的丈夫，在「文明進化，自由結婚」的時代裡，趙素華又在公開場合認識了防營統領官畢長康，兩人也是「一見鍾情」，趙素華因之在外流連一個月，並且與畢長康空開出雙入對。本回結束時，敘事者以爲「女如無德，直同挾瑟之娼，人盡可夫，亦是文明之化」[134]。由是觀之，男女交往的「自由、文明」化，顯然與傳統對女子的要求大不相同，而自由結婚卻是雙面刃，雖然可以締造佳偶，卻也有可能造成「失德」現象。

隨後小說又提出另外一對男女交往狀況來討論立憲後的男女關係。這一對男女分別爲黃陸生之表弟韓京兆與符碧芙。韓外貌出眾，才調過人，「留心經濟，雅善詞章，聲光化電，無所不通；詞賦文章，無所不曉」[135]，這位擁有古今中外知識的新型文化男子，對於當前女性的問題頗有自己一番見解：

> 現在的時勢看起來，那婦女之間人格最高的，自然是一班女學生了。但是近來的一班女子，只要今天一進學堂，明天就學得個滿身習氣，開口閉口總說什麼男女平權、夫婦平等。這句話原是不錯的，他卻不曉得做了一個女子先要有了平等平權的資格，方纔好說這樣的話兒……總之這些說話都是那班無恥的婦女，要做那曖昧的事情，借著這個平等、均權的一番說話拿來做個護身符兒。人家問起來，還只說我是照著文明的辦法，諸事自由。[136]

---

[133] 春騷：〈未來世界・第十三回 結愛友文明進化 仿泰西自由結婚〉，頁 101。
[134] 春騷：〈未來世界・第十四回 賣風情陌上遇檀郎 弔膀子包廂看夜戲〉，《月月小說》第 16 號，頁 111。
[135] 春騷：〈未來世界・第十五回 四目偷窺相逢一瞬 兩心巧印緣結三生〉，《月月小說》第 17 號，頁 115。
[136] 同上註，頁 115-116。

不只是先前提到的「學堂習氣」，在男女關係中更爲精確地分梳出「女學生習氣」，這是立憲後效法文明的弊端，平等、均權等現代化的知識與態度，成了女學生的藉口與說詞，引發更多的自由戀愛的問題。

然而這樣對女性有著極高要求的韓京兆，卻對閨閣氣息濃厚、喜歡吟詩弄詞，「講究服從主義」的女孩符碧芙一見傾心。小說文本在此提供了巧妙的對照，韓京兆／黃陸生、符碧芙／趙素華，其結合都是一方受過新式學堂教育，對戀愛充滿「文明嚮往」，然而卻都與保守思想者交往。但是韓、符乃因符母阻撓遂成悲劇，黃、趙卻是因趙素華的「女學生習氣」而無法長久。面對要將自己帶回家庭的丈夫，趙素華更是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 「我自有我的自由權，憑你什麼再是利害的人，也不能侵犯我的權限。憑藉你這樣的一個庸奴便想來牽制著我，我趙素華說的話兒，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從沒有改過口兒，我就是這樣的，和你退婚定了，看你可有什麼法兒！」[137]

我們可以看見趙素華的說詞完全與韓京兆對女學生的觀察若合符節，以文明論述作爲價值判斷，並親手結束這段婚姻。小說運用「安置（placement）—移置（displacements）—置換（replacement）」來處理趙、黃的婚姻，強調其最終的「離異」。並透過黃、趙／韓、符／夏、汪三組男女關係的對照，顯現出「立憲」作爲男女交往的時空背景，顯然仍有許多與傳統關聯，或與新時代氛圍有關的問題不斷在滋生。

面對這三組男女關係，作者（亦爲敘事者）也詳細說明了書寫的緣因：

> ……再說起那社會上的人情風俗來，更是個立憲自治基礎第一要緊的，就是那男女的婚姻。只要全國的同胞一個個都有了這般的學問，自然的男女結起婚來沒有那高低錯配的事情，良莠不齊的毛病。到了那般的時代，那家庭教育不知不覺的也就完備起來，人人都有自治的精神，家家具有國民

[137] 春騷：〈未來世界・第十六回 符碧符初見韓京兆 趙素華怒打黃陸生〉，《月月小說》第 17 號，頁 126。

的思想。[138]

作者以爲男女婚戀乃是立憲自治之核心，透過適當的男女相配，自然可成就良善的家庭教育。可以發現，不止是文本世界以立憲作爲一種思考方式，就連作者亦企圖以立憲來思考男女婚戀問題，強調意識形態對男女婚／戀的影響，是傳統保守主義，或是新型自由主義，總之在這樣青黃不接、半新不舊的時代氣氛下，拉出「立憲」此座標軸，來定義與定位婚／戀狀況，頗具覺世意味。

由這些小說可以看出「立憲」作爲一重要時代事件，在文學場域中引發的效用。小說家們以此爲背景／前景書寫，或討論當政者的作爲；或由此思考國民性的問題；更甚者將立憲作爲一種思維向度，觀察、反思當中各種小我／大我的互動改變。這些小說不只反映時代，更重要的是運用小說提供種種可能的狀況，除了覺世、遊戲外，更採用聚焦的方式凸顯、羅列出當前、未來所有可預期或不可預期的想像。

第三節 存心養性：國民性的再聚焦

透過前述討論，發現諸多小說對於國民性皆有所疑問，而當時許多知識份子對於「中國魂」多所討論。而在《月月小說》的「趣味—通俗—社會」的脈絡下，所渴望了國民性又是如何？《月月小說》中諸文皆揭示了兩種可能性：

吾故發囈語曰：「此報出現之日，即國民更生之期。」[139]

透過「文體—國體」的連結，強化當中對於國民性更新的意義，這是國民性重塑的可能性之一，與此持相仿意見的還有櫻花盦主：

風雲擾擾兮，值此廿世紀國民之懵懵兮。吾安得其不擾社會敗壞其種種

[138] 春颿：〈未來世界・第十八回 逞雄談趙素華舌粲蓮花 病驚秋符碧芙魂歸離恨〉，《月月小說》第 19 號，頁 140-141。
[139] 天僇生：〈論說〉，《月月小說》第 9 號，頁 8。

兮。吾又將乎誰尤招國魂以歸來兮，恃吾人精神以為之謀羌，開智譎諫而陳一紙兮曰：「吾道具所由有絕代之佳人兮，拚詞筆而換兜鍪，建奇功欲憑乎不聿兮。惟歌哭以挽神洲。」[140]

認爲《月月小說》可以在二十世紀招回國魂，以開國民智識，利用小說、文學、文化的功能爲神洲中國盡力。我們可從此中看見其針對《月月小說》的社會功能頗具讚賞與期待。

除此之外，也有將國民性的思考置放於「趣味」面向者：

人情蒼狗雲千變，世事紊絲軸一般。默化潛移無上策，仗君獨力挽狂瀾。
得有機關振墜風，賴將筆舌濟刑窮。黃金他日鑄巍像，小說應標第一功。
賈誼生平無限憂，震心猶坐欲沉舟。事權不屬無他計，試把珊瑚筆一抽。
笑極而啼啼極笑，糊塗天地又何論？文章且把當游戲，引起東方滑稽魂。[141]

除了將小說與社會連結起之外，更點出了面對當前時局的哭笑不得樣貌[142]，因而讚頌《月月小說》的遊戲文章能夠「引起東方滑稽魂」。在此的國魂、國民性轉爲一種「滑稽」的狀態，其實正是呼應了《月月小說》以趣味爲核心的本質，然而在這樣的滑稽背後，也蘊藏了諸多對國民性、國魂的深切觀察、討論與期盼，已溢出了純粹的玩、遊戲、趣味。本節從國民性、國民資格的書寫切入，希望可以聚焦出《月月小說》如何在小說中陳述、展演國民性問題。

一、教育養心以救國：鄉民 / 國民路迢迢

清廷在教育改革方面有諸多政策，其中較爲關鍵者爲廢科舉、開學堂與鼓勵留學，這三個政策徹底地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與框架，也衍生出許多新／舊之間的學問、價值的問題，以及留學生的習態（habitus）問題等等，小說對此皆有所批判與見解。此外，對於學堂教育制度、效用的觀察所在多有。可視當爲

[140] 櫻花盦主：〈月月小說報祝辭〉，《月月小說》第 10 號，頁 2。
[141] 愛樓主人：〈頌詞〉，《月月小說》第 21 號・週年紀典大增刊，頁 68。
[142] 關於當時具備傳統學問、新學的小說家的情緒討論，可見拙作：〈無理取 NOW：由吳趼人西遊記短篇續作論其知識狀態〉，《雲漢學刊》第 17 期（2009 年 3 月），頁 46-48。

對時候的教育改革、教育救國論的回應與觀察[143]。

不過「教育」是否真能順利通向「救國」？新式教育能否順利地打造新國民，更新國民資格呢？〈學界鏡〉對當時新興的學堂教育提出了想法：

> 「……辦學堂要先就各種學堂的性質上注意，譬如蒙小學堂則先去其遺傳的劣根性，養成其各種道德心；軍事學堂則振其尚武精神而發其愛國心；工商各學堂則導其合群的思想而動以競爭心，而又教授合法課程，完全加以形式整齊，規則縝密，何愁這學堂不辦得精神完滿？」[144]

分門別類地舉出蒙小學／軍事學堂／工商學堂的作用與訴求，強調「形式整齊，規則縝密」，整顯示出當時初步的學術分工狀態[145]，也是對於當時候教育改革的理念。必須注意的是，小說特意地強調各種教育都必須培養各種不同的「心」：道德心／愛國心／競爭心，正展現出了對於當時教育的希望，以及對於當時國民性的理想，必須組合此三「心」。而此三心不但結合了傳統價值與民族主義、天演思維的新思潮，更重要的是其指向了小我／大我／人我三者，但彼此所統轄的範疇不是絕對，反而是彼此互涉，甚至是有機地轉換、切換。這也表明了《月月小說》對國民性所提出的「方針」（男主角方真諧音）不是「於公於私」的分殊狀態，乃是由「心」出發，作爲一種指向全幅層面的醞釀、發端之美德。

不過同樣的「愛國心」，到了〈學究教育談〉中的「冬烘先生」身上，就成了言語諷刺：

> 年約五十許，面狹長如削瓜，背僂作曲線，雙目眴轉，睛深陷作碧色。先

---

143 當時有「教育小說」一類型的提出，可見其對於教育之關切以及企圖將「教育」轉化爲審美對象的可能。下文所舉〈學界鏡〉即被標爲教育小說。而對於此類小說的中觀研究，可參考梅家玲之討論，梅氏指出晚清文人在引進與創作教育小說時，所涉及的不僅是中西新舊文白的問題，也牽涉了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的翻新、文學傳統與現代性的往來交鋒，以及文化生產工業的介入，是「教育」和「小說」之間的相關問題。參見氏著：〈教育，還是小說？——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輯入梅家玲主編：《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頁 81-82。

144 雁叟：〈學界鏡 第一回・喜學成電催歸祖國 問目的語出動賓筵〉，《月月小說》第 21 號，頁 27-28。

145 陳平原以爲晚清、五四的學術範式有「走出經學時代、顛覆儒學中心、標舉啓蒙主義、提倡科學方法、學術分途發展、中西融會貫通等」幾種複雜圖景。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9。

> 生少讀書，不甚了了，嘗操觚學為文，累應童子，試以十數不能青一衿。年三十始娶妻。[146]

從外表、內涵看來，陸先生都不能稱上體面，且也只得童子之名，無法再繼續獲得科考。由此觀之，陸先生雖受古典教育，卻也非科舉應試的知識受益人。不過這樣的陸先生卻有一優點，即是「見有著短衣、習西文，或設學堂者，必唾之曰：『漢奸也。』」[147]的「愛國心」。

〈學究教育談〉揭示了科舉停辦後，傳統書院因應潮流而改爲學堂時的諸多荒謬可鄙狀態。「冬烘」的符號在小說中甫出現，其「迂腐」、「糊塗」的所指也就隨即被展示。居住在冬烘村中的「啓蒙者」陸先生一角設計更具豐富的意涵，一來身爲冬烘村的村民，顯然不會太清醒；二來身爲此村的傳遞知識者，但此村卻仍名爲「冬烘」，可見其是「冬烘之最」。

而冬烘先生的愛國心，也是有例外狀態時候：

> 先生家貧不能自贍，因仿古制傳食諸生家……村人從先生游者，咸言先生之課徒不以學級之高下維等地，而以飲饌之豐歉為等第……村人知先生指，每值先生枉顧，必增酒饌以飼先生。先生之受脩脯也，以節為期，每節前三日，村人陸續以桑皮紙裹小洋元致之先生。先生見洋輒作鶩鸕笑。綜而言之，先生平惡人道及洋字，惟收受脩脯時，則不能不一破成例。[148]

愛國心在酒食金錢面前隨即被打破，透過生活習慣的書寫，我們已可知陸先生的性格特徵：道貌岸然、貪財、注重表面。這樣的性格特徵在科舉被廢後，突顯更甚：

> 先生以為生平得噉飯處，因課徒耳。徒且往矣，飯於何有？不急設法維持之，先生且將墮入餓鬼道。乃與師母商酌至再久之，忽得奇策，即舊塾門首署以榜，榜曰「某某高等小學堂」，榜之側懸牌二上硃書作虎頭形，下

---

146 天僇生：〈學究教育談〉，《月月小說》第 12 號，頁 33。
147 同上註。
148 同上註，頁 34-35。

有文曰「學務重地毋喧嘩」，自是以後先生乃變舊日蒙師而為學堂校長。[149]

從「不急設法」、「再久之」、「忽得」幾個頻率副詞，可見陸先生的一切學問皆爲「飯」（財）所服務，原本是對設學堂十分鄙棄的「愛國心」，在失去經濟來源的狀態下也蕩然無存。在此，不但呈顯出所謂的「愛國」是如此不堪一擊，也顯現出所謂的「學務重地」不過就是改換幾個名詞，其對於新學制根本不熟，蒙師／校長的身分一夕之間就可轉換，這種「表現的」場景反諷[150]正展現了在教育改革時國民性的問題，也呼應了小說開頭言其住在「冬烘村」的言辭反諷。

由這兩篇小說來看，教育正面臨了兩重問題：一則正值轉型階段，有許多魚目混珠、掛羊頭甚至連狗肉都賣不起的學堂；二則這樣的教育根本無法變「鄉民」爲「國民」，遑論打造國民性。因此若要透過教育救國，師資就成了重點，若能有如方真這種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生，有理想抱負，自然能夠成就新式教育，也能從中培養出良善的國民性。

二、利益薰心下的複雜人性

（一）改寫傳統美德的女子社會

對於當時的諸多社會風氣，「社會小說」皆以此爲書寫對象，或闡明之、或批判之，而《月月小說》的社會小說中只有吳趼人的〈發財秘訣〉爲十回針對「社會風俗」所撰寫的長篇小說[151]，該小說開頭即點明了當時所謂的社會「風氣」，乃一「利」字，於是以此開展。區丙爲了發洋財，跟隨眾人腳步至香港作料泡買賣。「發洋財」是當時眾人的黃金夢，區丙以二錢銀子爲本，靠料泡賺了三千多洋錢，小說家以爲：

寫區丙癡呆之狀，描摹盡致，寫區丙乎！吾知作者之意，實為今日之發洋財者寫照耳。今之發洋財者，其癡呆如區丙，其忠厚尚不及區丙也。[152]

---

[149] 天僇生：〈學究教育談〉，頁 36。
[150] Muecke D. C.著；顏元叔主譯：《反諷》，頁 66。
[151] 其他長篇標爲「社會小說」者，皆以官場爲書寫對象，故於後討論。
[152] 趼人：〈發財秘訣・第一回 闢香港通商初發達 賣料泡窮漢得奇逢〉，《月月小說》第 11 號，頁 30。

小說家對舉出癡呆／忠厚兩狀，這點在區丙賺了不少錢後刻畫更細：

> 區丙一想：「……屈指一計，做這個買賣不覺三個多月了，我也該歇息歇息了，便從此不做生意，也不愁不是一個富翁了。」【評點：是鄉下人本色】……妻子打開一看，見是雪白的洋銀子，數了一數，整整的五十元，便笑道：「恭喜呢！是從哪裏發來這注財？」【評點：只五十元便如此，寫鄉下人可笑。】……區丙不答，在懷中掏出那包洋銀，打開取了十元交給妻子。喜歡得她笑得眼睛沒了縫，連忙接過揣在懷裏……取出那十元洋銀翻來覆去看了又看，不住的痴笑，又喃喃吶吶的自言自語道：「千萬不要是作夢纔好。」【評點：寫窮婆子如繪，不知怎生體會出來？】[153]

小說雖一方面寫區丙這對鄉下夫婦的狹隘眼界，見小錢便癡癡狀，但一方面也正狀其忠厚樣貌，尤其區丙在香港和外國人做生意時，並不哄抬價格，反而秉持著「賣給他不可賣貴了，恐怕他打聽出來，說我欺他」[154]的誠實想法，無怪乎可成爲「發財榜樣」[155]。

小說塑造出這對夫妻的正反雙重形象，寫其可笑又寫其可鄙，特別是對區妻見小錢眼開的形象不斷地透過相似性以重複聚合出其「窮婆子」的蠢樣，對此，小說家自然有其關注：

> 下半回無端寫區丙妻子種種醜態，非得已也……實痛夫女子社會中，實有此情景，特為之摹繪傳神，使他日女子社會進化時睹之，猶可見前人之面目也。[156]

此總評點出了小說下半回的聚焦（focalization）被固定（fixed）[157]在區妻身上的

---

[153] 趼人：〈發財秘訣•第二回 察嗜好貨郎逐利 發儲藏夫婦秤金〉，《月月小說》第 11 號，頁 34-36。
[154] 趼人：〈發財秘訣・第一回 闢香港通商初發達 賣料泡窮漢得奇逢〉，頁 27。
[155] 同上註，頁 29。
[156] 趼人：〈發財秘訣・第二回 察嗜好貨郎逐利 發儲藏夫婦秤金〉，頁 40。
[157] 聚焦是由敘述的施動者（narrating agent）、聚焦者（focalizer）和被聚焦者（focalized）形成的三位一體的關係組成。而人物形象的聚焦被固定，則是指限於某個單獨的人物身上。在此文本中，其聚焦的方式是透過複現區妻的講話（quoted dialogue）、間接複現區妻的講話（narrated dialogue）、引用其獨白（quoted monologue）、敘述其獨白（narrated monologue）等。這種一致性（constant）的引述，正展現了敘事者和聚焦者（區妻）之間的緊密關係。參見 Cohan, Steven（史蒂文・科恩）, Shires Linda M.（琳達・夏爾斯）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頁 104-110；巴爾（Bel, Mieke）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

用意，正是爲「女子社會」提供一反面例證。小說家特別標舉出「女子社會」，是當時對於女學重視的表徵，並在「學」之外，特意將劃出「社會」，據此可知，除了學堂的學習外，《月月小說》關注的更多層面是女性在社會性方面的問題，呼應了《月月小說》「趣味—通俗—社會」的脈絡，也正指出了女性在當時打造國魂／國民性時，實爲不容忽視的群類。

對於「女子社會」的關注，《月月小說》中亦有其他小說討論。〈巧婦〉中展現了對女子巧／拙的辯證，開篇即書寫了巧婦、拙婦的二元對立：

> 西鄰有孀婦以巧聞，事翁若姑有孝名，皆以巧故；東鄰有孀婦以拙聞，事翁若姑弗能得厥歡，皆以拙故。[158]

所謂的巧、拙乃是由「事翁若姑」此事判準，而且這兩位皆是失去丈夫的「孀婦」，因此巧婦之巧，正在於能夠對已缺席的丈夫之父母有「孝」。然而這樣的巧／拙對立關係卻在「群盜大掠」時有了翻轉：

> 巧婦聞警急，自為計，預匿累薪之陰，陰窺盜所為良久。盜縛翁若姑鞭笞之，且恫喝以白刃……既而盜搜括一空去。
>
> 未幾，盜又大掠而東入拙婦家。婦預匿翁姑隱處，獨挺身出抗聲語諸盜曰：「諸君皆綠林豪傑，吾以一弱婦人與諸君抗，不智。然諸君以自命為豪傑者，而或欺侮一弱婦人，則又不武……」群盜聞婦言大慚恧，率其黨一無侵擾去。
>
> 東西鄰人乃莫不嘖嘖稱拙婦，而唾罵巧婦不去口。[159]

巧婦因其「巧」而能自保；拙婦因其「拙」而無法自保，但在這巧／拙之間，卻涉及了能否「保全家庭」這個關鍵。也就是巧／拙之間的辯證關係一旦放到「群盜」前，立刻有了新的可能，對「巧」的揚棄正說明了此時對女性的巧／拙之辨不再只是對家庭內的孝順與否，而是能否在危機時刻擔負起保全家庭、偏向社會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167-190。不過〈發財秘訣〉透過敘事者的緊密聚焦，卻又透過評點的方式直接在小說內部製造另一種聲音，拉開距離以保持清晰、超然的評論。藉由「若即若離」的書寫策略對當時的社會風俗給予刻畫，又提供讀者閱讀上的遠／近距離觀察和反思。

[158] 柚斧：〈巧婦〉，《月月小說》第 23 號，頁 199。

[159] 同上註，頁 199-200。

性的價值，也說明了對女性美德排序已在此時產生變化。

不過雖然有「女子社會」的概念，但女性改革的問題卻往往與男性關聯至深，〈小足捐〉說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當時社會上禁纏足，強調要解放「天足」，〈小足捐〉結合時事，寫一官員提出纏小腳需納稅的政策，其見解頗善：

> 纏足之害，世所共知，歷代相沿，一時頗難盡禁，不如倡立小足捐，使其不禁自禁，則國家得此一時之利益，婦女免受无妄之災殃。從此足之小者，漸易為大；足之大者，漸易為平，此實興利除弊，一舉兩得之事。[160]

看似提升女權之舉，卻惹來上司的質疑，在施行上有問題，且「天足會」與宗教關係甚密。女性身體進入法制體系中，就成爲父系社會（Father’s Law）的權力展演場。女性改革的問題顯然已不止是女性自己的事，此點在小說結尾更被暴露出：

> 忽有一同寅，出而戲之曰：「君欲謀裾下風流差事乎？未知如夫人之纖纖蓮瓣，肯否先放？不然君既得風流差事，中飽自由，斷難免先捐風流帳款也。君以為是耶！非耶！」[161]

在此戲言中，不但消解了「小足捐」提出的正當性外，更點出了當時女性權力能否興起，其實與男性關係甚大，在「纏足」一事上，本爲取悅男性之舉[162]，如今能否「解放」自然也與男性「觀點」（male gaze）息息相關。

（二）崇洋媚外的社會風氣

除了女性權力興起外，對於社會風俗陋習更多乃是刻畫其熱愛金錢、利字當頭上。回到〈發財秘訣〉上，其開篇即言「利」。小說在區丙發財一事傳出後，安排了「認親戚」的事件：

> 那時一鄉之人，都知道區丙發了財了。親族鄰里那一個不來巴結。同里的

[160] 陶安化：〈小足捐〉，《月月小說》第 6 號，頁 181。
[161] 同上註，頁 185。
[162] 丁乃非：〈鞦韆．腳帶．紅睡鞋〉，輯入張小虹編：《性／別研究讀本》（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32-36。

說起來都是區大爺長、區大爺短；同族的不是說大叔叔，便是說大伯伯，甚至同姓不同宗的都來認本家、敘輩份。還有可笑的是有一種姓歐的、一種姓歐陽的，也強來認本支。[163]

見錢眼開的庸眾，除了巴結逢迎外，甚至拋棄姓氏宗族，總之硬要攀上關係，透過中國傳統常識理性[164]的質變，傳遞了價值轉型期的新時代中「唯利是圖」的國民性問題。

面對這樣的情景，區丙卻仍保持一貫的忠厚，「生性醇厚，見人家來親熱也不過如此；從前人家疏遠他時，他也不過如此。」[165]區丙的前後一致，對比餘人的前倨後恭，徹底地凸顯「利字當前」的國民性問題。這樣的主旨也在〈醫意〉中被彰顯。〈醫意〉的故事是一位還在向老醫生學習的童子，如何順利解決婦人難產問題。小說不斷強調「醫者意也！醫者意也！不知醫意，不可以為醫」[166]，強調醫生所醫治的不只是病人肉體上的問題，更核心、更關鍵者乃在「意」，即病人靈魂上的問題。於是當老醫生入城，有人著急叩門求診，原來是為妻子難產而來：

童子乃笑曰：「既皆然，治易耳。」
其人詫為神，長跽以請……
童子瞑然思，有閒曰：「以錢投產婦，子當立下。」
其人大喜，躍出門，飛騎而去。
童子又闔門，下鍵入，微笑曰：「醫者意也！醫者意也！不知醫意，不可

---

[163] 趼人：〈發財秘訣‧第三回 開店舖廣交亡命 充漢奸再發洋財〉，《月月小說》第 11 號，頁 41。
[164] 常識理性為金觀濤、劉青峰討論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性」時所提出的論點，其以為「中國文化的終極關懷是道德，常識理性是道德的基礎，使得兩者緊密整合，即一個從另一個推出，並不存在西方工具理性中那種理性與終極關懷表現出的二元分裂狀態。」而其進一步指出，十九世紀中國引進西方現代理性主義時，與中國傳統的常識理性所發生的扞格：「在這一階段，中國士大夫盡可能學習西方現代理性主義對從現代科技到社會制度的論證，甚至形成了類似於西方終極關懷與理性呈二元分裂的結構。」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多元現代性及其困惑〉，《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 80 期（2008 年 11 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106045.htm（2009 年 3 月 25 日測試為有效連結）；金觀濤：〈中國文化的常識合理精神〉，《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 6 期（1997），頁 459。在〈發財秘訣〉中，我們可見到中國傳統常識理性的質變狀態，本為以儒家意識形態運作的中國社會，強調「親親」、「尊尊」等王權、紳權、族權的社會構成，在西方理性論述中不但與新的意識形態對話，更有新的優先順序。而區丙此癡呆／忠厚並存的角色，更是此時代氛圍下的典型人物，他們順應社會，因此不如以往忠厚；但又因民智未開，因而不至於狡獪智巧。
[165] 趼人：〈發財秘訣‧第三回 開店舖廣交亡命 充漢奸再發洋財〉，《月月小說》第 11 號，頁 41-42。
[166] 武：〈醫意〉，《月月小說》第 7 號，頁 185。

以為醫。」[167]

從這段對話中，可見童子秉持著「醫意」精神來處理難產問題，而其解決之法不是由醫學知識，而是用「錢」。而從兩人互動中可知來人對於童子的尊敬，其「詫為神」、「長跽以請」的舉動，都將童子的能力推到極高；爾後得到解答，又「大喜」、「躍」出門、「飛騎」而去，皆顯其歸心似箭，以為童子之解甚為精闢。然而對比此二人的心領神會，小說在此造成一「懸念」[168]：錢與意的關係，何以金錢能夠解決難產？

這個懸念在小說結尾處，透過老醫生被傳遞出：

老人口含煙半燼，始點首，繼搖首曰：「顧何從而得治之方也？」
童子大笑曰：「何師之愚也！今世知中國人，孰是見錢而不出攫者哉？」[169]

懸念在小說結尾被解除，原來「今世」中國人的意與錢已密不可分，小說極端地將「赤子之心」指向了金錢，既然尚未出生的嬰孩都有「愛錢之端」，那麼更何況是成年人。本來這樣的旨意甚為嚴肅，但小說一開始即標為「滑稽體」，於是本來沉重的指控在此稍被消解，透過幽默的「節省趨向」（tendency to economy）[170]，將本來面對此場景中的各種不愉悅感轉變為愉悅感[171]，對於國民性的不滿，也隨著童子「大笑」而成了插科打諢的遊戲狀態。

在追求利益的風氣驅使下，人人都想「發洋財」，因此崇洋媚外之風亦大行其道。〈發財秘訣〉中區丙深刻地體會到會講外文之重要性，因此將自己的兒子（區牧蕃）送去與陶慶雲學習外文。對於外文之重視，可見一斑：

慶雲道：「方纔牧蕃哥說讀過兩年書，那兩年倘然讀的是外國書，此刻不

---

[167] 武：〈醫意〉，頁 187-188。
[168] 懸念是「人物、聚焦者知道的比讀者多」的狀態。參見巴爾（Bel, Mieke）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頁 191。
[169] 武：〈醫意〉，頁 191。
[170] 佛洛伊德在分析詼諧時，指出其多有一種「簡化」的技巧，透過特殊的縮寫或特殊的節省，製造詼諧。參見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著；彭舜，楊韶剛譯：《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0），頁 76。
[171] 皮丁頓（Pidding, Ralph）著；潘智彪譯：《笑的心理學》，頁 137。

是寫字，也可以做個跑樓了。不是我說句甚麼話，中國書讀了有甚麼用處？」[172]

有用／無用全取決於現實工作上，寫字、跑樓都是與洋人打交道的工作，其皆屬於買辦體系[173]，而這類工作的重點即是「外語能力」，因此陶慶雲判斷區牧蕃讀的兩年「中國書」是浪費時間之舉，因之根本無法爲其生財。所以小說此回即以「欲識發財秘訣，先要審辨時機。兩句洋涇浜話，到底落了便宜」作結，正表明了當時整體社會崇洋媚外之風，而此風正與「利」息息相關。

然而既是根植於利益上的崇洋，自然學問不高不深，〈發財秘訣〉藉由陶慶雲累績西文知識一事，寫其學問之膚淺：

慶雲又叫鹹水妹 ：「取過我那本薄子來。」鹹水妹取出一本外國簿子，慶雲接過。取出鉛筆，在那簿子上寫了『饑荒』兩個字，底下又注了『嗇棉』，兩個字，又在旁邊照樣描了那一路外國字。【評點：「描」字妙！可見未曾會寫也。】阿牛看見便要借來看，慶雲順手遞給他。雪畦道 ：「慶雲兄真是留心。將來你的英話怕不學的精而又精。」慶雲道：「越是這種冷門說話，越是不能不留心。萬一東家要說起來，回答不出，豈不要受他兩句夫盧。」[174]

透過「描」外國字一舉，說明了其根本不會，一切都只是「生意」考量，怕被東家夫盧（fool），小說透過「延宕」（slow-down），對其舉動刻意緩速地描述[175]，藉以凸出陶慶雲根本無心於求學，一切只爲利益的樣態。

到了小說最終回，眼見陶慶雲一般人節節發財，看在冷雁士眼中不是滋味，於是去找知微子算命：

---

[172] 趼人：〈發財秘訣・第四回 區牧蕃初登寫字樓 陶慶雲引見鹹水妹〉，《月月小說》第 11 號，頁 52。

[173] 寫字是文書，買辦則是協助中外貿易的中介，可以翻譯亦可以居中溝通。有等級之差別，收入也大不相同。〈發財秘訣〉第七回中即對此體系的升遷頗有描寫。

[174] 趼人：〈發財秘訣・第五回 學洋話陶慶雲著書 犯鄉例花雪畦追月〉，《月月小說》第 12 號，頁 79。

[175] Cohan, Steven（史蒂文・科恩）, Shires Linda M.（琳達・夏爾斯）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頁 97。

> 雁士道 ：「小弟今年四十歲，看別人發財，實在看得眼熱了，因此要算一算自己的命。」說罷，便告知生辰八字。知微子排成四柱，分配了官印財劫，放下筆來，一想，道：「貴造日坐文昌，時上正印透露，又是八字純陽，是個讀書種子，性格剛強。就此而論，已無發財之望了。」……（知微子）「閣下如果一定要發財，在下也有一個秘訣，可以傳授，但恐閣下不肯做罷了。」知微子附耳低聲說道：「你若要發財，速與閻羅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換上一個獸心。」[176]

整篇小說圍繞的「發財」展開，透過最終的對話更展現出對當時熱衷金錢、利益當前的國民性之批判，甚至以爲這些爲追求金錢而不顧一切的舉動已非「人心」所爲，實乃「獸心」之舉。特別是知微子言其冷雁士「日坐文昌」、「性格剛強」之命，已無「發財之望」，特別點出了國民性的深刻問題：人性之泯滅。

（三）人心／獸心的抉擇

對於人／獸的修辭策略，在〈介紹良醫〉中也被運用，其敘事者（我）爲一吃喝嫖賭樣樣「精通」者，一日睡夢中恍惚遇一西洋醫生博士，被該醫生判斷有病：

> 「你的病是臟腑裏中了一種毒，弄成一個極頑極硬的東西。這毒氣化作黴菌，從毛孔鑽出，又傳染到別人臟腑裏去。」[177]

要醫治這種病，則必須「將臟腑一件一件取出，換上一句完好的」[178]，但無奈博士走訪整個中國，竟多「同病相憐」者，因而決定要換上動物的臟腑：

> 原來這狼是最孝順不過的，記得《聊齋》上載著一個狼請了一位外科醫生給他媽治療毒，所以博士用了狼心；那犬的義氣、馬的忠心更是刮刮叫，便又用了馬肝犬肺；還有那虎生下兒子，小心餵養，真是再要慈善沒有了……因此我和博士商量用了虎膽。[179]

---

[176] 趼人：〈發財秘訣・第十回 舒雲旃歷舉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發財訣〉，《月月小說》第 14 號，頁 97-100。
[177] 闓異：〈介紹良醫〉，《月月小說》附第 21 號，頁 38。
[178] 同上註。
[179] 同上註，頁 40-41。

一一細數各種畜牲動物的良善，對比開篇即言自己「嫖賭吃喝鴉片樣樣精通」、「機巧變詐也知道一二」以及「素性崇拜外國人，差不多外國人放的屁都是香的」之樣，人／獸之間顯然成爲一辯證關係。更絕妙的是在這手術結束後，我的改變：

> 我現在真個成了人面獸心，並且還想變做極好的行為，這不是件奇事嗎？……換了臟腑之後，想起往日所做的事，心裏老大難過，面上也熱辣辣的，似乎怕見人。[180]

人面獸心竟比人面人心還有知羞恥，對人心的揚棄透過辯證法揭示了當時國民性的問題。而此小說標爲「遊戲小說」，透過當時新興的科學／醫學知識，要爲中國人「診斷」，最後換上獸心；藉由遊戲之筆的節省原則，引起笑、幽默的情緒，實則寄寓深刻。

三、道德國民的提出

那麼《月月小說》的理想國民又是如何呢？關於這點，可從國民小說〈刺國敵〉切入，〈刺國敵〉說的是一個本來爲自由極樂的國家斯崖騰，被野心勃勃的強權專制國家何史得入侵，致使人民不復從前之自由，能人志士起而復國的故事。

小說一開頭便開始定義「國度」：

> 話說地球上的國度，總有幾十百千，幾十百千的國度，細細算起來，不過幾十百國，可以算得實實在在是一箇國度，其餘的不視為他人侵滅，就是為他人附屬。不是沒有政治的思想，就是沒有建設的資格，這種國度不配有稱國的名號，將要為天演裡淘汰去了。但這幾十百可以算得是國的國度，再細細算起來，也只有幾十國度，可以算得完完全全是一箇國度……但這幾十可以算得完全國的國度，再細細算起來，也不過六七八國，可以雄視著地球上，種種由他作主，能夠長長久久保住他的自由，沒有人敢侵犯他的。[181]

---

[180] 闓異：〈介紹良醫〉，頁 42。
[181] 角勝子譯演：〈刺國敵・第一回 角勝子詳說自由義 極樂國失去獨立權〉，《月月小說》第 1 號，頁 151。

透過層層遞減的敘述，顯示出真正獨立的國家乃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企圖召喚出讀者對於「國家」的想像／渴求[182]，然而這背後所欲指向的核心則是一「自由」的概念。

而為了國家獨立的自由，斯崖騰的諸位志士們分別在各地喚醒民眾，最後集結各股力量，終於順利推翻外來專制強權。而這在「復興國家」的歷程中，小說安排了各式各樣的感情在當中運作：親情、愛情、友情等等，在「大我」利益的前提下，小我皆需順應，以羅肫之和裴露姬愛情的衛星事件為例：

> 裴露姬豎起一對柳梢眉，泛白了兩面杏花腮，說道：「你這沒良心的人，我下次也不情願來了。」羅肫之被裴露姬這樣的當頭一棒，好似青天裡打了個霹靂，十分詫異……（裴露姬）發怒道：「你當我做怎麼人？你不要冤煞人了。」羅肫之只得央求他道：「……我情願冒著了國賊的臭名聲，甘心的做何史得的牛馬的奴隸，都是為著你……」裴露姬聽了這番話，只得從實告訴他道：「我與你決絕，我並不是為你對著我沒良心，我正是為你對著斯崖騰國沒良心。我想你是斯崖騰國一個完全清潔的貴族，受過斯崖騰國多少恩惠，現在不聽了你叔父正直的訓誨，壓制同胞國民自由奴顏婢膝，甘心屈服，事奉那暴虐凶險的管領，當不共戴天的大仇敵，做自己的父母的主人一般看待，不是沒良心賤奴，請問你是甚麼？」[183]

戀人絮語中竟然有著國族論述，敵對的國家立場／相愛的戀人濃情，在此兩相對比下以及調和下，顯然是有著價值道德上的判斷順序。透過戀人的道德勸告，喚醒了羅肫之的「國家意識」，敵國公主寧願犧牲愛情，也不願良人是一沒良心的賤奴，超越了國家／個人利益，完全站在道德層面進行呼告。裴露姬又言：

> 「……那知你是斯崖騰的人，反加沒有這等思想，還要幫助著管領殘害自己的同胞，真是投之有北，有北不受；投之豺虎，豺虎不食的人。況且世

[182] 此處可以參考前輩學者在討論晚清小說／報章作為一個西方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新興「想像共同體」時所扮演的任務與角色。有賴媒體的抽象性與傳播性，讀者／人民才能藉由過去的共同歷史經驗「發明／創造」（invent）一個新的國家。參考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世紀出版，2005），頁 6，10-11；李歐梵講演；季進編：《未完成的現代性・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6-7；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 283-284。

[183] 角勝子譯演：〈刺國敵・第十一回 裴露姬真心勸知己 羅肫之回意聽情人〉，《月月小說》第 6 號，頁 115-117。

界上的公理，壓制力愈重，反抗力愈大，我知斯崖騰人民已經有立會聯盟的人民，反抗政府的思想，抵制外族的主義，恐怕那管領害世也不能久生於此，你羅大臣若不及早回頭，也免不得為自己的國民殺戮……從此洗心革面，不為何史得效力，竭力的救助你自己的同胞，收復你祖國的自由，將來我與你同做個自由極樂國國民，何等快活，何等自由。」[184]

這段言論放在愛情的語境中顯然過於雄心壯志，少女與情人的最大願望是「同做個自由極樂國國民」，可見「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透過「公理」、「祖國」等強而有力的大論述，不但整併了愛情，也可見道德的藍圖不但可放大，成爲整個國家的理想，亦可作爲小我的理想狀態。

不論是教育問題，或是對社會風俗，小說多從「心」、「念頭」上去彰顯國民性的問題，這種心的種種活動[185]，蘊藏了當時在中／西價值接合上的轉變、落差、困頓和重新整理，《月月小說》對於國民性的描繪仍多採取遊戲、滑稽的筆法，而非如論說性文章的直陳、控訴。一方面保留了《月月小說》對小說本質的把握；二方面也藉由此種修辭策略來陳列國民性，在幽默、滑稽、趣味中品嘗出苦澀；三方面透過丑角化的人物，也正對比出理想型人物的完美。

小結

本章主要目的以文本世界爲中心，考察小說如何重寫時事，文學沒有反映現實的責任，但文本世界卻不可能不和現實世界打交道。因此，我們必須先掌握《月月小說》發行時期（1906-1908 年）的文化背景，主要是立憲／革命的路線之爭；新興的百科全書式知識框架；社會生活與風俗的革新三個面向。此外，在《月月

[184] 角勝子譯演：〈刺國敵・第十一回 裴露姬真心勸知己 羅肫之回意聽情人〉，《月月小說》第 6 號，頁 117-118。

[185] 劉紀蕙在討論中國與台灣二十世紀初期現代化過程中，提出了「心的變異」。劉氏以爲，當時的「心」（軀體的心靈活動，psychic process）成爲可以被語言構築、技術操作的藝術品，脫離了活潑狀態而僵化固著「國家」。其受到精神分析的啓發，以「變異」（perversion，「正常」性快感模式之外獲得快感的所有行爲）角度來關注「心」的政治軌跡。參見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 9-13。回到《月月小說》時期，「心」是被關注的焦點，一切肉體作爲都根植於此，因此當小說家有感於當前國民性的問題時，也歸結於心上；企圖更新國民性時，也希望培養各種「善心」。這種關注於心、心念的思維，或許有更大部分受到當時「氣學」的影響。有清一代，對於形下的「器」與在人世間活動的「氣」關注甚多，主張「理在氣中」，並以此反撥陽明心學。

小說》中已展示了同樣的時事於不同文類中的不同書寫策略：評論性文章可以斷然地支持立憲，但在小說中，卻對立憲有許多保留與再思考。

被小說重寫的立憲事件成爲一種思考方式，小說家對比、幻想出立憲前後的不同，試圖在「立憲」的座標軸上對公／私領域進行滑動。不過在「立憲」這個大時局下，小說配合當時「國魂」論述，聚焦於「國民性」上，從文體—國體的連結上，可看出其欲招回國魂、教育國民，但《月月小說》特別提出了「滑稽魂」，也因此，在其批判當時中國人的各種「心」之問題：鄉民性、利益薰心等等，往往採取幽默、趣味、滑稽、遊戲的修辭，保留了《月月小說》對小說本質的把握、進一步陳列「不完備的國民資格」，也透過丑角化的人物，對比出理想型人物的完美。

《月月小說》中的時事、社會關注問題，正是在警覺世人、作爲遊戲嘲諷對象之間，深刻地展現了《月月小說》對於這些材料處理的另外一種可能性：擺盪在入世／出世之間。其一方面揭露醜態、陳列問題，但另一方面卻透過大量的遊戲筆墨、笑聲去消解、翻轉這些重量，採用辯證的揚棄態度面對諸多美德、政令、新知等論述。這正是《月月小說》在覺世、遊戲外的其他可能，也是其與其他小說雜誌的沉甸重量不同之處。